

## 通俗讀物編刊社與戰時歷史書寫(1933-1940)\*

劉龍心\*\*

### 摘 要

成立於 1934 年 7 月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是九一八事變之後以抗日宣傳為目的所成立的學術性社團，其前身為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抗日會。初期嘗試以唱本、戲劇和大鼓書等形式，創作適合大眾閱讀的通俗讀物，宣揚抗日意識，並成立三戶書社銷售其出版品；後因抗日色彩鮮明，受到日本和國民政府干預，脫離燕大，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並透過實地調查與分析，深入了解民間通俗讀物的流通管道，發展出「舊瓶裝新酒」的創作理論，從而編印各種定期刊物、叢書、畫刊及戰時國民讀本。發行量龐大，影響深遠，是為 1930-1940 年代致力推廣通俗大眾化讀物的重要社團。

過去學界對於通俗讀物編刊社的研究，大多著重在主要領導人物顧頡剛一人身上，或是側重於文化史角度的分析。本文則嘗試以最新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及過去較少為人利用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原始出版品，配合部份成員的回憶，分析 1930-1940 年代通俗讀物編刊社如何在通俗化和大眾化的訴求下，發展出一套「舊瓶裝新酒」的書寫策略，並討論此一因應戰時需要而重新改造的歷史書寫方式，對於重塑現代歷史意識和國民現代性的影響，以及通俗讀物編刊社在這方面的努力及其所遭遇的困境。

**關鍵詞：**通俗化、大眾化、舊瓶裝新酒、顧頡剛、通俗讀物、歷史書寫

---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通俗讀物與戰時歷史書寫」(NSC 95-2411-H-031-004)之部份研究成果。感謝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8 年 12 月 2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 年 5 月 1 日。

\*\* 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注意到通俗讀物編刊社這個社團，是個人這幾年從事學術社群研究時的一個附帶議題；大凡研究顧頡剛或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學者，都會注意這個因應抗日環境需要和通俗大眾化走向而出現的社團。通俗讀物編刊社的成立，固然可以放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整個大時代的環境下加以察考，把它看做是抗日救亡意識主潮的一環，但是從學術社群和歷史書寫的角度審視此一社群，似仍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這也是本文立意之所在。

目前學界有關通俗讀物編刊社的討論，多半仍環圍在顧頡剛身上，如美國學者 Laurence A. Schneider 所寫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多處提及 1930、1940 年代顧頡剛在通俗讀物和推廣大眾文化上的努力，並且概述了顧氏本人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企圖透過歷史地理和通俗讀物，為民族搏成的現實問題提出檢討；而西北考察之行，更使得顧頡剛體認到民族問題與大眾文化對於抗敵宣傳的重要性。<sup>1</sup> Schneider 的研究有著許多發人深省的論述，只可惜對通俗讀物的討論，可能受限於資料問題，無法有比較全面的觀照。其次如劉起鈞於 1986 年所著《顧頡剛先生學述》一書，對於顧氏編寫民眾讀物的緣由經過不乏著墨，但所述仍以顧氏個人回憶為限。<sup>2</sup> 另外相關的作品，如洪長泰的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一書，亦與本文討論的問題多有相關。洪氏一書由於受到文化史理論的影響，導入了不少新的視野，重新探討戰時大眾文化的本質與功能，甚至有一整章是討論「舊瓶裝新酒」的創作和相關的文學論辯，不過洪長泰的關注焦點側重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如老舍（舒慶春）和老向（王向辰）等人為代表的通俗讀物創作上，較少論及通

---

<sup>1</sup>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279-300.

<sup>2</sup> 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35-238。

俗讀物和歷史書寫之間的關係。<sup>3</sup>此外，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sup>4</sup>和洪長泰於 1985 年出版的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sup>5</sup>雖與本文所探討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仍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照背景。前書從白話報刊、閱報社、宣講所、演說會和戲曲改良運動等方面，討論清末最後十年間下層社會的啓蒙運動；而洪氏在 *Going to the People* 一書中，則探討五四以降民間文學研究者在徵集研究歌謠、民間傳說、諺語和兒童文學上所做的努力。此二書使本文在分析通俗讀物編刊社的角色和創作理路時，得以對清末以來知識分子透過各種通俗大眾化的表現形式啓迪大眾的這一脈絡，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事實上，一直以來對於通俗讀物編刊社的研究，最大的困難恐怕還是出在資料的問題上。就其編輯出版的項目而言，大體可分成：定期刊物、叢書、畫刊、戰時國民讀本等類別。定期刊物如《大眾知識》、《民眾周報》、《求生之路》，以及上海《申報》副刊的「通俗講座」、《包頭日報》、《綏遠日報》上的「通俗論壇」等；叢書類則有甲、乙兩種，甲種是以舊小說體裁編寫的民族英雄故事和亡國慘痛史，乙種叢書是以大鼓詞、歌曲、快板書的形式寫成的通俗小冊子；再一種則是年畫、連環畫等畫刊，以及代地方政府編印的戰時國民讀本等。<sup>6</sup>這些出版品往往以極低廉的售價打進下層社會和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保守估計，通俗讀物編刊社自 1933 年成立以來，至 1940 年為止，總共發行過六百多種書籍，發行量高達五千萬冊之多，而此尚不包括各種圖畫和翻印的讀物在內。<sup>7</sup>

<sup>3</sup>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87-220.

<sup>4</sup>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sup>5</sup>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up>6</sup> 劉克讓，〈介紹通俗讀物編刊社〉，《秦風日報》，1937 年 12 月 1 日，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卷 3(1933-1937)，頁 737-741；邵恆秋，〈顧頡剛創辦通俗讀物編刊社所起作用〉，收入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19-120。

<sup>7</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301。

如此龐大的出版品，對研究者而言，無疑是沉重的負擔，更何況這些出版品多半已十分難以查找。筆者多次前往中國大陸找資料的過程中，不時留意相關材料，但除少數定期發行的刊物之外，各種當年銷售量極廣的小冊子、大鼓書和畫刊等，已極難看到。也許從某個角度來看，這類極為通俗的大眾讀物如此徹底地消失，其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長期以來，各大圖書館對於收藏這類通俗讀物的意願不高，一如中小學教科書或宣傳品般，不被知識菁英或文化人認為有典藏的價值，即便日後觀念改變，如果不是有人當下收藏，也極難回流到二手市場或公私立圖書館。加以這類書籍售價便宜，讀者不是隨看隨丟，就是輾轉傳閱，民眾的閱讀習慣，可能也是造成這類讀物難以存留的另一個原因。再者，更根本的原因也可能和這類出版品的屬性有關，通俗讀物編刊社所編寫的這批通俗讀本，絕大多數和抗日救亡的題旨相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推出之時自然極受讀者歡迎，可是一旦時空轉換，事過境遷，一般民眾對於保留這類書籍的意願自然相對遞減。這種現象尤其在通俗大眾化的作品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一如許多民間文學研究者發現，民間歌謠只有在被社會普遍接受的情況下，才能持續保持其生命力，並逐漸成為民間共同的作品流傳下去，反之，則可能自然消失。<sup>8</sup>而通俗讀物編刊社所出版的這類具有高度抗日救亡意識的通俗讀本，極可能是在這種情況下遭到自然淘汰的命運。因此，日本學者小倉芳彥在 1980 年代介紹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出版品時，也只能針對他所能看到 1930 年代的 11 種小冊子而論。<sup>9</sup>所幸，近幾年來陸陸續續出土了一些史料，使得通俗讀物編刊社可以有較為完整的面貌，一補過去學界對此論題的不足與限制，其中又以近來出版的《顧頡剛日記》最具代表性。此一日記的問世，配合早年通俗讀物編刊社成員的回憶，使得顧頡剛對於大眾讀物的看法、政治立場，及其與通俗讀物編刊社的關係等，都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

---

<sup>8</sup> 相關議論可參見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pp. 4-5.

<sup>9</sup> 小倉芳彥，〈通俗讀物編刊社の出版物——1930 年代の抗日ペンフレット 11 種〉，《調查研究報告》（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期 17（1983 年 3 月），頁 61-112。

因此本文在此基礎上，將以通俗讀物編刊社現階段所能找到的期刊、小冊子和參與成員的日記、回憶等材料為根據，分析 1930-1940 年代通俗讀物編刊社如何在通俗化和大眾化的訴求下，發展出一套「舊瓶裝新酒」的書寫策略，並討論此一因應戰時需要而重新改造的歷史書寫方式，對於重塑現代歷史意識和國民現代性的影響，以及通俗讀物編刊社在這方面的努力及其所遭遇的困境。

## 二、從三戶書社到通俗讀物編刊社

根據顧頡剛的說法，通俗讀物編刊社的成立大會應該在 1934 年的 7 月 27 日，<sup>10</sup>與會者包括顧頡剛、徐炳昶、范文瀾、孫楷弟、吳其昌、謝國楨、王庸、劉節、容庚、李一非和王守真等二十餘人，當天的會議除了討論該社的章程之外，並決定了職務分配和分頭募款的辦法。<sup>11</sup>然而在此之前，通俗讀物編刊社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即以三戶書社為名，編寫並發行過不少通俗讀物。1933 年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抗日會成立，洪業出任宣傳組組長，顧頡剛任宣傳幹事。最初該會商議宣傳辦法時，顧頡剛曾於會中提議以懸賞徵求大鼓詞和劇本之法，推廣抗日民眾讀物，獲得與會者一致的贊同。<sup>12</sup>與此同時，由燕大學生組成的燕大學生抗日會赴戰區慰勞隊適從熱河勞軍歸來，表示熱河戰區普遍缺乏戰時讀物，而熱河義勇軍又十分盼望燕大教師們能為其編寫教科書。為此，顧頡剛便與國文系教授郭紹虞商議，於國文系加開一門「通俗文學習作」課程，一面編寫教科書，一面結合學生創作唱本、戲劇、小說和大鼓書等通俗讀物，<sup>13</sup>並成立三戶書社出版唱本、編印畫片，是為燕大教職員與學生抗日會的附屬機

<sup>10</sup> 洪長泰根據賀龍及老向的說法表示：三戶書社於 1938 年成立於漢口，而通俗讀物編刊社成立的時間則在 1931 年 9 月。此與後來出版的《顧頡剛年譜》、《顧頡剛日記》和通俗讀物編刊社成員的回憶皆有不同。見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p. 216.

<sup>11</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216；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22。

<sup>12</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05。

<sup>13</sup> 王煦華，〈顧頡剛先生學術紀年〉，收入尹達、張政烺等編，《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下冊，頁 1036-1037。

關。同年 6-7 月間，更開辦金利書莊，專門銷售三戶書社刊印的出版品。<sup>14</sup>

在三戶書社期間，燕大教職員、學生抗日會首先擬定了幾個題目，再以登報徵求文稿的方式，向大眾公開徵稿，鼓勵創作。<sup>15</sup>這次的徵稿意外地獲得了廣大的迴響，兩個月之間陸續收到六、七十本稿件；<sup>16</sup>收齊來稿之後，再由教職員和學生抗日會組成評審小組，由顧頡剛、洪業、馬鑑、郭紹虞、高君珊、吳世昌、鄭德坤等人，負責審閱這批稿件。<sup>17</sup>最後獲獎的作品無一不是取材自真實故事，並且是以切近時局的抗日救亡為題材。<sup>18</sup>燕大教職員抗日會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將得獎作品與後來刊印的《宋哲元大戰喜峰口》、《二十九軍男兒漢》、《義勇軍女將姚瑞芳》、《漢奸報》、《胡阿毛開車入黃埔》、《嘆朝鮮》等，<sup>19</sup>均交三戶書社出版。出版時，三戶書社還特意模仿了地攤上暢銷小書的形式，以紅綠套印的封面，加插一張戲裝照片吸引群眾。最初，三戶書社對於這些書籍的銷量並沒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每種只印了 5,000 本，銷到小書鋪，再由小書鋪分散到各個書報攤上販賣；沒想到這些小書不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賣完了，有些小書鋪甚至為了賺錢，便把銷得快的冊子都再自行翻印，像是《宋哲元大戰喜峰口》，據說半年之內就加印了 70,000 冊之多。<sup>20</sup>

<sup>14</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10。

<sup>15</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51-52。

<sup>16</sup> 如《傀儡皇帝坐龍庭》、《胡阿毛開車入黃埔》、《二十九軍大戰喜峰口》等。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青聞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頁 365。

<sup>17</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09-210。

<sup>18</sup> 比賽結果分三等，第一等 3 名，第二等 7 名，第三等 37 名。其中由趙伯庸以義勇軍抗日的真實故事《杜泉死守杜家峪》，獲得了第一名，第二名《翠紅姑娘殉難記》則主要是描寫瀋陽陷落之後的慘狀，第三名以下則有劇本形式的《淞滬戰》、牌子曲的《哭朝鮮》和彈詞體的《義勇軍女將姚瑞芳》等等。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51-52；劉起鈺，《顧頡剛先生學述》，頁 236。

<sup>19</sup> 王真，〈記顧頡剛先生領導下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收入《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107；小倉芳彥，〈通俗讀物編刊社の出版物——1930 年代の抗日ペンフレット 11 種〉，《調查研究報告》，期 17，頁 86-89。

<sup>20</sup> 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 365。《宋哲元大戰喜峰口》究竟由小書鋪翻印了多少冊，說法不一，顧氏在〈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中表示印了 70,000 冊，但通俗讀物編刊社在戰時檢討「舊瓶裝新酒」的座談會上，卻說由舊式書店翻印行銷了 700,000 冊。兩者數字差距極大，大概與調查統計之時間點有關。見〈關於「舊瓶



小書鋪大量翻印，雖有良好的銷售量，卻沒有為三戶書社帶來太多利潤，金利書店不得不在第二年（1934年）因營運不佳宣告倒閉。<sup>21</sup>此時三戶書社為了擴大經費來源，獲得政府補助，<sup>22</sup>於是開始向教育部社會教育司請款。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杰對此表示贊同，惟建議三戶書社之名必須有所變更，<sup>23</sup>因「三戶」之名具有「三戶亡秦」的寓意，明顯的抗日意圖，不但與政府當時的外交政策牴觸，也容易遭受日本抗議。為此，三戶書社在1933年10月脫離燕大教職員與學生抗日會，正式更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同時向外招募社員，<sup>24</sup>成為一獨立的學術社團，而教育部也同意每月撥款100元補助出版（不久之後增加到200元）；中山文化教育館亦通過月給稿費500元資助。<sup>25</sup>1936年7月，顧頡剛再透過朱家驊和葉楚傖的協助，取得國民黨中央黨部補助款20,000元，<sup>26</sup>通俗讀物編刊社的經濟問題暫獲解決，摩拳擦掌準備展開推廣通俗大眾化讀物的工作。

### 三、「舊瓶裝新酒」——通俗化與大眾化

通俗讀物編刊社成立之後，由顧頡剛出任社長之職，基本社員最初仍以燕大教職員和學生居多，如吳世昌（字子臧）、鄭侃嫵、連士升、楊績（原名楊季微，筆名楊剛）等，皆為顧頡剛在燕大的學生，此後陸陸續續加入的成員有王守真（又名王受真、王真、王日蔚）、<sup>27</sup>李一非、陳軾（字仙泉）、趙紀彬（字象離，筆名向林冰）、邵恆秋、張秀亞、郭敬堂、王柳林、李景辰、王冰洋等人。取得教育部補助款後，雖然暫時解決了經濟上的難題，但接踵而來的

---

21 裝新酒」的創作方法座談會記錄），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漢口：生活書店，1938），頁110。  
22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15。  
23 王受真（王守真），〈再論「為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22。  
24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12；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92、98。  
25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103。  
26 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366。  
27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55。  
28 王真，〈記顧頡剛先生領導下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收入《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104-106。

問題是：通俗讀物編刊社所出版之書刊，因不再能堂而皇之地以「抗日」為號召，以致其編刊路線不得不有所調整，而所出書刊亦不能再有「抗日」一類的字眼；其次，三戶書社時期所出版以抗日為訴求的鼓詞書，雖然在市場上頗受歡迎，但這類創作畢竟不是出身學院的燕大教職員、學生所擅長，因此編刊社決定暫時放棄鼓詞寫作，轉而致力於通俗故事叢書的編纂。<sup>28</sup>

只是初初成立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此時並沒有固定的期刊做為宣傳陣地，對於如何推廣通俗讀物也還處於摸索狀態。為此，顧頡剛運用了個人學術資源與人脈關係，先後介紹社員將稿件投到當時已頗具規模的報刊雜誌上去，如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sup>29</sup>以及葉聖陶在上海所辦《中學生》等，並於1936年2月與上海《申報》館取得聯繫，商定自3月19日開始，在《申報》副刊上設連續性的「通俗講座」專欄，並取得月付120元的稿費，<sup>30</sup>是為通俗讀物編刊社最早刊行的一份定期出版品。<sup>31</sup>有了固定宣傳陣地之後，顧頡剛亦重新修定了通俗故事的編寫方向，認為必先從人物著手，因為人物是歷史的主角，也是最能引起大眾共鳴的題材。可是怎麼去描寫人物，以及應該描寫哪些人物，才不會像三戶書社時期以真實抗日人物為對象，而遭日本政府的抗議呢？顧頡剛說：「他們不許我們抗日，難道抗遼、抗金、抗元、抗清的故事都不許我們重提嗎？我們何嘗不能借了近古的史事來提倡現代應有的民族意識。」<sup>32</sup>因此，選擇歷史上具有抵抗意識的人物，便成了通俗讀物編刊社此一階段創作的重要題材。而上述報刊雜誌登載的文章，即幾乎清一色以歷史人物傳記為書寫對象，他們儘可能地避開了與當前局勢有關的現實題材，選擇了像勾踐、子產、岳飛、史可法、鄭成功、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關天培、張季直等寓

<sup>28</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330-332；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29-230。

<sup>29</sup> 該專欄創刊於1934年9月，是一份由燕大教授群為主所創辦的刊物，主要編輯有洪業、張蔭麟、容庚、顧頡剛、容肇祖、洪思齊與張印堂等人。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26；美國中文資料中心編，《史地周刊》(Washington: 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4)。

<sup>30</sup> 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366。

<sup>31</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主編之《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於1936年3月19日發刊，每周一刊，至1937年8月5日為止，共發刊72期。

<sup>32</sup> 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366。



涵民族意識的英雄人物，<sup>33</sup>規避日人的挑釁與詰難。

因應抗日環境的需求，通俗讀物編刊社此時一方面從大量的「歷史書裡找尋可用的材料」，一方面也開始重新檢討「除了提倡民族意識外」，還應該灌輸民眾什麼樣的知識。對此，通俗讀物編刊社於《申報》「通俗講座」〈發刊詞〉上所揭櫫的「喚起民眾」之意，指出了他們思考的方向：

「喚起民眾」的目的，不僅要使他們知道自己生活的貧乏，應當努力求知能來改進，同時要使他們了解此刻國家的危機，他們對於國家的責任，應當怎樣為自己為國家打開險惡的環境，努力奮鬥。並且在這個世變日亟的時代，尤其應當知道做一個現代國民必須有的基本常識。<sup>34</sup>

他們認為中國民眾不僅在物質生活上匱乏，同時在精神生活上亦因智識技能的不足而顯愚昧，數千年來因襲傳統思想，養成「愚妄，誇大，依賴，盲從，自私，信命運，不團結」和對政治冷漠的積習，使中國老百姓完全失去了做為現代國民的資格。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來自於在市面上流傳甚廣的通俗讀物。<sup>35</sup>他們認為這些一般民眾所熟悉的唱本、鼓詞、彈詞和評話小說等，傳遞了太多陳腐封建的觀念，支配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習慣、思想行為、娛樂，甚至是死後的喪葬習俗。<sup>36</sup>

顧頡剛和王受真<sup>37</sup>認為五四運動以來所倡導的白話文學、普羅文學，雖然

<sup>33</sup> 由鄭侃懋代顧頡剛所作之〈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於1935年11月時交《中學生》發表。見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30、242；賀光，〈鄭成功〉，《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2，1936年3月26日，第5張；周源，〈史可法〉，《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38，1936年12月3日，第5張；李季珍，〈岳飛的少年時代〉，《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39，1936年12月10日，第5張；蘇子涵，〈關天培將軍〉，《申報》（上海），「通俗講座」，1936年11月26日，第5張。

<sup>34</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發刊詞〉，《申報》（上海），「通俗講座」，1936年3月19日，第4張。

<sup>35</sup> 洪長泰指出：五四以降的知識分子和民間文學家，認為存在於傳統文化中陳腐的價值觀，才是導致中國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根本原因。所以像顧頡剛一類的學者，雖然對民間文學抱持著浪漫主義的色彩，但終不免走向「改革工具論」的觀點，把民間文學當成是改良社會的利器；相信從民間文化入手，洗滌傳統社會封建的價值觀，改變民眾的生活觀念和方式，才能建設一個新型態的社會。見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pp. 166-170.

<sup>36</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發刊詞〉，《申報》（上海），「通俗講座」，1936年3月19日，第4張。

<sup>37</sup> 戰前通俗讀物編刊社成員，除顧頡剛外，大部份的社員都以筆名或化名發表文章，蓋因躲避日

讓文字通俗化了，但是影響所及，仍然只在都市和受過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身上，大部份的下層民眾依舊與此不相干。<sup>38</sup>他們認為有些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被視為以白話文創作的經典，在文學上雖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思想內容上，卻充滿了因果報應、神仙鬼怪等封建意識，這些「阻礙社會進化」、「違反科學精神」的內容，無疑是新文化運動深入大眾的最大勁敵。所以通俗讀物編刊社自 1936 年開始，創辦自己的發表園地《民眾周報》時，即喊出了「舊瓶裝新酒」的口號，提出通俗讀物應該用大眾所熟悉的舊形式，灌注新國民應有的意識，使現代科學常識、革命思想、國家觀念和民族精神，取代舊讀物中迷信、妄誕、淫猥的成分；<sup>39</sup>並且繼續五四以來啓蒙主義的精神，用通俗的口調教育國民，激發民眾的向上意志，提高民族的智能。<sup>40</sup>

在通俗讀物編刊社成員的概念中，五四運動以來所謂的通俗化作品，始終與大眾化的觀念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矛盾與衝突，向林冰稱此為「通俗化的反大眾化」，以及「大眾化的不通俗化」，<sup>41</sup>意即許多流傳民間的作品，雖然極為通俗，但內容卻陳腐不堪；而內容前進的大眾化作品，卻往往囿於形式，不易為大眾接受，失去了通俗化的可能。<sup>42</sup>「前者形式上抓住了大眾，內容上失掉了大眾；後者是內容上代表了大眾，形式上不能接近大眾。」<sup>43</sup>因此所謂「舊瓶裝新酒」的概念就是要確認：「健全的大眾化，是通俗化；合理的通俗化，

---

人的追查，王守真便經常化名為王受真，發表其對通俗讀物的看法，而其刊載於《禹貢》半月刊之文，則常用王日蔚之名。事實上，顧頡剛有非常多的文章是由社員代作，經其修改後再以顧氏之名發表，因此〈為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一文，刊載在《民眾周報》，卷 1 期 5（1936 年 10 月 30 日）時，署名為顧頡剛，抗戰爆發後，生活書店將戰前《民眾周報》上有關通俗讀物創作理論的文字收錄起來重新出版時，才將作者正名為王受真。見王受真，〈為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13-17。

38 顧頡剛，〈通俗讀物的時代使命與創作方法〉，原載《民眾周報》，期 1 創刊號（1936 年 10 月 2 日），頁 15。王受真，〈為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13。

39 通俗讀物編刊社，〈發刊詞〉，《申報》（上海），「通俗講座」，1936 年 3 月 19 日，第 4 張。

40 顧頡剛，〈通俗讀物的時代使命與創作方法〉，《民眾周報》，期 1 創刊號（1936 年 10 月 2 日），頁 5、16-17。

41 向林冰，〈「舊瓶裝新酒」釋義〉，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35-36。

42 向林冰，〈舊形式的新評價〉，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60。

43 向林冰，〈「舊瓶裝新酒」釋義〉，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36。

是大眾化的。」<sup>44</sup>

在發展「舊瓶裝新酒」的創作理論過程中，通俗讀物編刊社在某種程度上受到 1930 年以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所提出「文藝大眾化」理論的影響；1934 年文藝界有關文學「新舊形式」和「大眾語」的討論，對通俗讀物編刊社的「舊瓶裝新酒」路線也有所啟發。不少左聯作家紛紛強調，要用「勞動群眾自己的言語」，「去創造革命的大眾文藝」，即如左聯重要成員瞿秋白認為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同時存在著「古文的文言、梁啟超式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話和舊小說式的白話」；雖然舊小說式的白話仍有其缺點，但要比抄襲歐、日文法的五四式白話來得接近群眾，<sup>45</sup>而且是群眾讀慣了的。因此「革命的大眾文藝」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利用「舊形式」的優點，逐漸加入「新的成份」，養成群眾的新習慣，運用說書、灘簧、小唱、文明戲等，創造群眾容易接受的新形式。像是利用流行的小調，夾雜著說白，編成紀事的小說，或是創造新式的歌劇；利用純粹的白話創造有節奏的大眾朗誦；利用演義的體裁創造短篇小說，和最通俗的論文等等。瞿秋白強調革命的大眾文藝「可以是舊的題材的改作」，也可以是革命鬥爭的「演義」，所以像《新岳傳》、《新水滸》，或是洪楊革命、五卅罷工、香港罷工等都是很好的題材。<sup>46</sup>而魯迅在討論新舊文藝表現形式時，也認為大眾化的作品必須「採取」某些舊形式，只是舊形式的採取，並不意味著將舊形式「整個」捧來，在此過程中舊形式「必有所刪除，必有所增益」，而其結果應該是「新形式的出現」。<sup>47</sup>魯迅此一觀點，亦即日後向林冰所謂的「因襲即創造」、「服從即征服」的概念。向林冰認為運用舊形式的目的，不是為了迎合大眾的落後意識，或向舊形式投降，而是要在量的

<sup>44</sup> 向林冰，〈「舊瓶裝新酒」在文化發展史上的任務〉，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72。

<sup>45</sup> 瞿秋白認為新的文學革命不但要肅清文言的餘孽，更要推翻「白話的新文言」，一切都以新興階級的話來寫。而他所謂的新興階級，指的不是一般的鄉下人或農民，因為鄉下人的言語是原始的、偏僻的；他主張應該用在五方雜處的大都市裡，各省人互相談話、演講、說書的「中國的普通話」來寫，才能創造最淺近的新興階級的文學。見宋陽（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號（1932 年 6 月 10 日），頁 3-5。

<sup>46</sup> 宋陽（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號，頁 5-6。

<sup>47</sup> 魯迅，〈論「舊形式的採用」〉，《且介亭雜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16-18。

改造中，爭取舊形式質的轉化，並且以肯定舊形式為起點，導出舊形式的自我否定。<sup>48</sup>在這些基本態度上，通俗讀物編刊社「舊瓶裝新酒」的創作理念，可說延續了左聯部份代表人物的觀點。

雖然，1930年代初期有關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仍有著許多不同的見解，對於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對抗日救亡工作究竟能不能有所助益，也充滿了歧見，但就如洪長泰指出的：戰爭一方面強化了通俗文學的地位，卻也改變了其所關注的焦點。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整體抗日救亡意識的展開，通俗大眾化作品漸漸在「抵抗文化」的主流聲浪下，將焦點轉向政治和民族主義的訴求上。<sup>49</sup>從某個角度來看，1930年代以來文藝界對於新舊形式的討論，即反映了這個轉向。質言之，在救亡日亟的年代裡，期待舊形式能為新文化注入能量，其背後即寓涵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命義，即對於新民族文化形式的探索。通俗讀物編刊社在推廣通俗讀物的過程中，秉持了顧頡剛從事民俗學研究以來，把大眾文化和傳統聯繫起來的一貫態度，<sup>50</sup>企圖透過存藏在民間文化中的巨大能量，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找到更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表現形式。<sup>51</sup>他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西洋文化的全盤接受，和對中國固有文化遺產的籠統反對，不但不能使西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有機的聯繫，而且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積極部份，也未能加以「批判的攝取」與「揚棄的繼承」。<sup>52</sup>面對日益嚴峻的抗日形勢及抗戰建國運動，他們相信唯有從民間文化中汲取養分，才能更為積極有效地創造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文化。<sup>53</sup>

<sup>48</sup> 向林冰，〈舊形式的新評價〉，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67-68。

<sup>49</sup>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pp. 189-190.

<sup>50</sup>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pp. 148-156.

<sup>51</sup> 洪長泰亦認為顧頡剛是從肯定通俗文學對抗日救亡工作有益的立場出發，而其「舊瓶裝新酒」的主張，也是結合了書寫與口傳兩種形式，以通俗文學和民間文學並用的方式，創作具有抵抗意識的通俗讀物。見 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pp. 191-192.

<sup>52</sup> 向林冰，〈「舊瓶裝新酒」在文化發展史上的任務〉，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70-71。

<sup>53</sup> 有關中國民族形式的問題，一直持續到 1940 年代，周揚、艾思奇、何其芳、冼星海等人先後在延安的《新中華報》、《文藝突擊》、《中國文化》等報刊上為文討論，並舉辦座談會，內容

事實上，從通俗故事的編寫到「舊瓶裝新酒」創作理論的成形，通俗讀物編刊社也是透過邊學邊做的方法一步步摸索。爲了深入了解通俗讀物爲大眾接受的情形和喜好程度，通俗讀物編刊社首先針對民間銷售通俗讀物的管道和購買力進行調查。1936年通俗讀物編刊社派出孫祥林，在北平市區一帶調查舊式讀物的流通管道和銷售量，並據此寫成〈民眾讀物流通情況的調查〉報告，<sup>54</sup>他們發現舊讀物的流通方式和一般圖書很不一樣，以北平一地來說，舊讀物的批發，除了幾家較具規模的書店外，大街上隨處可見的行販和地攤也是主要的管道。此外，糖販、雜物販和下層民眾常聚會的茶館等地，亦不時兼賣或兼營租閱書籍的生意。至於北平以外的地方，通俗讀物編刊社透過一場全國性的大調查發現，北平幾家主要書局的勢力甚至深入江浙、豫皖、陝甘、東北等地，形成一個幾乎遍及全國的發行網。透過此次的調查，通俗讀物編刊社才驚覺到通俗讀物在民間的影響力，及其特殊的行銷管道。<sup>55</sup>在這個行銷網中，一般人是很難介入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如果不利用這些舊有的發行網，幾乎根本打不進各省、各縣及各鄉鎮，書籍自然到不了民眾的手中。因此，如果真要利用這個發行網代銷讀物，就不得不採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改造形式、裝幀都與舊式通俗讀物一樣的書籍，因爲在這個發行網之下，一般人是不能接受新形式書籍的。<sup>56</sup>

在民眾購買力方面，通俗讀物編刊社在調查行銷網的同時發現，一本大約四、五頁厚薄的舊通俗讀物，一分錢大概可以買到三本，一角錢可以買個三十幾本，一塊錢可以買到三、四百本，三塊錢平均下來可以買到一千多本。這中間再經過商販的盤剝取利，到讀者手上時，一本大約也不過一到兩分錢。而且舊讀物根本沒有版權，每千本的成本不過兩塊七、八角錢，書商賣這類的書，

---

涉及文學、詩歌、戲劇、音樂、美術等方面。向林冰和通俗讀物編刊社「舊瓶裝新酒」的觀點此時受到不少來自左翼陣營的批判。參見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冊3，頁36-46。

<sup>54</sup> 王真，〈記顧頤剛先生領導下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收入《顧頤剛先生學行錄》，頁109-110。

<sup>55</sup> 王受真，〈爲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14-15。

<sup>56</sup> 王受真，〈再論「爲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20-22。



基本上賺的只不過是包紮工料費，為的是吸引顧客上門，來買他們主要營業的字帖、尺牘和私塾教本等等，<sup>57</sup>所以只要價錢一提高，大眾的購買力根本無法配合，買得起的人就不多了。因此通俗讀物編刊社做了這項調查之後，盡其可能地壓低價錢，像是抗戰初期委託生活書店發行的《大眾抗敵劇叢》每本定價四到八分不等，最貴的《黃家莊》開價一角錢，而《戰時通俗讀物》系列，也差不多是二分錢到五分錢不等。<sup>58</sup>另外像是五彩通俗圖畫每張零售價三分錢，為達宣傳效果，批發五百張十元，一千張十八元。<sup>59</sup>戰前發刊的《民眾周報》每期篇幅高達四十頁，零售價是三至四分錢，半年二十四期六至八角，全年四十八期售一元到一元五角。<sup>60</sup>發刊三個月之後，直接訂戶就有 4,600 戶，零售每月可達 2,000 份。<sup>61</sup>《大眾知識》的單價看似較高，可是以半月刊的形式出刊，每期售價一角六分錢，半年十二期一元六角，全年二十四期二元八角，和《民眾周報》相比，價錢相差不大，篇幅也有七、八十頁之多。

然而，無論如何壓低售價，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的雜誌、書籍仍然無法像舊讀物一樣可以用一到二分的價錢賣出，<sup>62</sup>《民眾周報》的訂戶看來不少，零售業績也不算壞，四十多頁一本賣四分錢，看來也比舊讀物划算，可是訂閱戶還是以學生居多，<sup>63</sup>真正下層民眾的購買力仍然薄弱。<sup>64</sup>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最主要還是因為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的各類出版品，都是新創作的作品，稿費

<sup>57</sup> 王受真，〈再論「為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19。

<sup>58</sup> 顧頡剛，〈通俗讀物論文集〉，「生活書店廣告」。

<sup>59</sup> 《民眾周報》，卷 2 期 6（1937 年 2 月 5 日），廣告頁。

<sup>60</sup> 《民眾周報》，卷 2 期 3（1937 年 1 月 15 日），廣告頁。

<sup>61</sup> 紀彬，〈為本刊革新敬告讀者〉，《民眾周報》，卷 2 期 4（1937 年 1 月 22 日），頁 10。

<sup>62</sup> 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 366。

<sup>63</sup> 王日蔚，〈學生讀者與本刊的革新〉，《民眾周報》，卷 2 期 4（1937 年 1 月 22 日），頁 12。

<sup>64</sup> 抗戰前國內物價雖有波動，但一般而言，躉售物價和零售價格都尚算平穩，根據《申報年鑑》所調查之各業男性工資，以 1933 年之「普通工資」為例，其中製釘業每月工資 37.5 元，居各業之冠，柳器業工資最差，每月所得僅 3 元；其他如棉織業 7 元，紡紗業 14.5 元，碾米業 10 元，麵粉業 12 元，榨油業 7.95 元，紙煙業 18.5 元，造紙業 6.35 元。詳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冊 1，頁 443-454。而戰前一般日常生活開銷，亦可參考《吳宓日記》中之記載，如修理眼鏡費用約 2 元，搭乘北平市政府公共汽車，由城中赴香山價約 8 角，東興樓宴客四人，花費 7 元，《吳宓詩集》一部價約 2 元等等。見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冊 6，頁 38、8、47、51。



開支往往形成不小的負擔，就以〈徵稿啓事〉上的訂價來看，每千字稿費一到三元，<sup>65</sup>一本十萬字的章回小說就要一百至三百元不等；彈詞、舊劇、故事之類的讀物每冊大約四千至一萬字，每冊稿費也要四至三十元，加上印刷、出版、行銷，開銷不可謂不大；即便是社員創作不取稿費，經濟上的負擔仍然很吃力，難怪顧頡剛在通俗讀物編刊社成立之初四處籌錢，幾度心灰意冷，想「令其自滅」。<sup>66</sup>尤其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後來懷疑通俗讀物編刊社左傾，停發補助經費，<sup>67</sup>導致 1936 年出刊的《大眾知識》只出了十二期，便不得不走上停刊之途。<sup>68</sup>

爲了打進下層社會，通俗讀物編刊社對讀物的內容和形式，也不時調整方向。基本上「舊瓶裝新酒」的創作理念是針對下層民眾的，但是「下層民眾」指的究竟是誰？是城市裡的勞動階級，還是鄉下老百姓？通俗讀物編刊社對此其實並沒有十分清楚明確的定義。對照晚清以來知識分子所從事的「開民智」運動，<sup>69</sup>或五四之後知識分子下鄉所展開的民間文學調查工作來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所指稱的「下層民眾」，若不是粗通文字的人，就是處於社會底層、不識字的文盲、鄉下人或農民。<sup>70</sup>如果按著這個脈絡來看，通俗讀物編刊社所謂的「下層民眾」，指的大約也是同一批人；然而爲了解決下層民眾不識字（或粗通文字）的困境，通俗讀物編刊社則希望藉助所謂「中介人」的力量，把所欲傳遞的新知傳達給多數不識字、不讀書的老百姓。而這裡所謂的「中介人」，指的就是「一般舊知識分子，半知識分子，說評書的，唱大鼓的」和青年學生。

<sup>65</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徵稿啓事〉，《民眾周報》，卷 1 期 1（1936 年 10 月 2 日），封底；〈改訂投稿簡則〉，卷 1 期 10（1936 年 12 月 4 日），無頁碼。

<sup>66</sup> 雷文景輯，〈顧頡剛致鄭德坤信函輯錄〉，《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4 期，頁 6。

<sup>67</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66。

<sup>68</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73。

<sup>69</sup> 李孝悌認爲晚清時人在從事啓蒙大眾的運動時，對於何謂下層 / 下流 / 下等社會，只有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並沒有十分嚴格的界定。一般而言，白話報所針對的基本上是一些粗通文字的人，而戲曲、宣講、演說等，則是針對不識字的人而設計的。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頁 11、19-21。

<sup>70</sup> 據洪長泰的研究指出：1920-1930 年代中國民間文學研究者對於「民眾」的定義，大體上接受了歐洲學者的概念，即泛指生活在文明邊緣、風俗陳舊的人，一般指的不是農民，就是居於社會底層的文盲、鄉下人。見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pp. 8-9.

王受眞強調：一切知識必須經過他們的理解、消化，才能傳達給一般民眾。<sup>71</sup>因此通俗讀物編刊社絕大部份的創作品，包括定期刊物、章回小說、鼓詞、戲曲、通俗故事等都是以中人為對象的，由這些中人把「讀」來的東西，或說或唱給不識字的老百姓「聽」，<sup>72</sup>進而改造下層社會。

確定了讀者的對象之後，<sup>73</sup>讀物的形式和內容才得以確立。經過幾年經驗的累積，通俗讀物編刊社對於「舊形式」的把握愈來愈嫻熟，他們從最早的鼓詞、劇本、彈詞創作，到後來發現了民間各種多樣化的體裁，如章回小說、平書、鼓書、唱曲、舊劇、小調、歌謠、相聲、雙簧、拉洋片、連環畫、年畫等等。<sup>74</sup>這些體裁為了適應各個地方環境而存在，故而表現出濃厚的地方性。通俗讀物編刊社在推廣和創作的過程中發現，舊形式的讀物除了圖畫之外，文字的作品只有極少數（如章回小說）是供閱讀的，其他大部份多屬於演奏說唱的形式，其中說的東西（如平書、相聲）又比唱的東西來得少。<sup>75</sup>因此通俗讀物編刊社為求作品能唱，便開始著手分析平劇、鼓書、戲詞、曲詞、歌謠的用韻方法和詞句構造，以求創作出更適合大眾說唱的形式。<sup>76</sup>為此，1937年通俗讀物編刊社還特別成立了「大鼓書訓練班」，聘請著名的盲人鼓書演唱者翟少屏來上課，並修改他們的創作作品。<sup>77</sup>

<sup>71</sup> 王受眞，〈為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裡〉，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13。

<sup>72</sup> 顧頡剛，〈我們怎樣寫作通俗讀物〉，《抗戰文藝》，卷2期8，1938年10月29日，頁116。

<sup>73</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對於讀者對象的掌握，也時常處在調整與摸索的狀態，《民眾周報》發行四期後，編者應讀者投書時回答，他們假定的閱讀對象是「鄉師學生、初級中學學生、鄉村小學教師、都市中店員工人，及能看《七俠五義》的舊知識分子。」《民眾周報》，卷1期4（1936年10月23日），頁48-49。

<sup>74</sup> 顧頡剛，〈我們怎樣寫作通俗讀物〉，《抗戰文藝》，卷2期8（1938年10月29日），頁116。

<sup>75</sup> 屬於民間文藝的戲劇、鼓書，甚至文字讀物（小說）都是向大眾講說的，極少是個人獨賞的性質，因此這種有聲的告白形式，必然又與音樂結合，轉化成一種具有宣傳意味的綜合藝術。見向林冰，〈舊形式的新評價〉，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64-65。

<sup>76</sup> 顧頡剛，〈大鼓詞怎樣作法〉，《民眾周報》，卷3期3（1937年4月16日），頁2-7；顧頡剛，〈我們怎樣寫作通俗讀物〉，《抗戰文藝》，卷2期8（1938年10月29日），頁116。

<sup>77</sup> 由翟少屏訓練出的九位大鼓書演唱者，在4月9日徐炳昶宴請傳作義時受邀演唱，傳作義聽了之後很是喜歡，便請他們到部隊裡去演唱《百靈廟》，頌揚傳作義部隊的戰績，因其表演生動，感動了不少在場的聽眾。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367。

「舊瓶裝新酒」的創作路線，在通俗讀物編刊社推廣多年之後，逐漸取得知音同好的認同。抗戰爆發後第二年，遠從濟南奔赴後方參加抗戰行列的老舍，與茅盾、郭沫若、馮乃超、夏衍、胡風等支持抗日的文藝界人士，於 1938 年 3 月在漢口組成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sup>78</sup>與此同時，老舍擱置了新文學小說寫作，開始嘗試以「舊瓶裝新酒」的概念，從事鼓詞創作。爲了寫出合韻能唱的作品，老舍特別請教由北方逃出來的大鼓書藝人富少舫和董蓮枝，了解北平大鼓書和山東大鼓書的作法；也由馮玉祥收容的唱墜子藝人那裡，學習了河南墜子的唱法，<sup>79</sup>根據這些寫成了《王小趕驢》、《張忠定計》、《打小日本》等大鼓書詞，和以京戲爲表現形式的《新刺虎》、《忠烈圖》、《王家鎮》、《薛二娘》，以及舊小說《兄妹從軍》等。他認爲這些作品，不論是大鼓書、小說、京劇，形式雖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爲了通俗與激發民眾抗戰熱情。<sup>80</sup>

1938 年 8 月，文協總會遷往重慶之後不久，隨即展開通俗讀物的編寫、出版工作，<sup>81</sup>並獲得國民黨中宣部和教育部補助款，陸續開辦通俗文藝講習會，延請在通俗讀物創作上已有相當經驗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成員參與，如向林冰、王澤民等均前往支援講授理論與方法課。<sup>82</sup>文協成員老向發表鼓詞創作《募寒衣》，經平音大鼓手山藥旦（即富少舫）修改後試唱，還特別邀請了顧頡剛、

<sup>78</sup> 1938 年 3 月 27 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到會者百餘人，大會推舉蔡元培、周恩來、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等 13 人爲名譽主席團；邵力子、老舍、馮玉祥、郭沫若、陳銘樞、田漢、張道藩、胡風等十餘人爲主席團。並由周恩來、郭沫若、鹿地亘、馮玉祥、邵力子、吳組緝共同起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甘海嵐編撰，《老舍年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 92。

<sup>79</sup> 老舍，〈我怎樣寫通俗文藝〉，《老舍曲藝文選》（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2），頁 33-36。

<sup>80</sup> 老舍，《忠烈圖》，收入老舍，《三四一》（重慶：獨立出版社，1938），頁 42。

<sup>81</sup> 文協接受了國民黨中宣部的委託，代爲編寫街頭劇、大鼓詞、兒童讀物、通俗小說、軍歌民歌和民眾游藝指導法等，並交由中宣部印刷發行。見〈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會務報告——七月二日報告〉，《抗戰文藝》，卷 1 期 11（1938 年 7 月 2 日）；〈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會務報告——10 月 15 日報告〉，《抗戰文藝》，卷 2 期 6（1938 年 10 月 15 日），分別收入老舍，《老舍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卷 15，頁 607-608、613-615。

<sup>82</sup> 〈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會務報告——11 月 5 日報告〉，《抗戰文藝》，卷 2 期 9（1938 年 11 月 5 日），後收入老舍，《老舍文集》，卷 15，頁 616-617。

張道藩、張默生等人前往參加。<sup>83</sup>此時，雙方成員對於「舊瓶裝新酒」的理念雖不盡完全相同，但時有交流往來。顧頡剛對於老舍、老向等文協成員一面編鼓詞，一面開辦講習會，教育新一代鼓詞創作者的做法，感到十分欣慰，認為「這個工作已經有人繼續去做，擴大去做」了！<sup>84</sup>

老舍等文協成員，在實際從事「舊瓶裝新酒」的創作之後，發現所謂的「舊形式」，不能只在體裁上講究，內容和思想上也要運用老百姓所熟悉的形式，像是《秋胡戲妻》、《武家坡》、《汾河灣》等戲，用的都是同一個套子——也就是故事結構，可是老百姓並不因為缺少變化而討厭他們。老舍以為有了相同的套子，思想上也得「差不多」，可以把原來講「忠君」的故事，改為「忠國」，把平日俠腸義膽的舊道德思想，改成捨身成仁的例子；利用舊套子來裝故事，也利用舊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戰上來，重寫新的《連環套》與《投軍別窰》，讓「故事既像舊的，又是新的；思想既像舊的，又是新的」，這樣才容易被大眾接受，達到宣傳的效果。<sup>85</sup>

事實上，文協此一推廣「舊瓶裝新酒」的做法，也是通俗讀物編刊社多年下來累積的經驗。編刊社成員在實際進行通俗讀物流通調查之後即發現，只有民眾懂得的、或聽過、見過的，他們才會感到興趣，才肯花錢來購買；凡是在名目上使民眾感到陌生與茫然的，多半銷路都不好。有的時候創作者必須站在民眾的立場，想像他們熟悉的題材，再去改換其中的內容。例如，介紹新疆史地時，就不能老老實實地用這個題目，否則根本引不起老百姓的興趣，可是換上一個《新西遊記》的名字，<sup>86</sup>老百姓就願意掏錢買了。所以像是《彭公案》、《連環套》裡大名鼎鼎的竇爾敦，到了通俗讀物編刊社的手裡，便從一個嘯聚

<sup>83</sup> 〈中華全國文藝抗敵協會會務報告——10月29日報告〉，《抗戰文藝》，卷2期8（1938年10月29日），後收入老舍，《老舍文集》，卷15，頁615-616；甘海嵐編撰，《老舍年譜》，頁111。

<sup>84</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89。

<sup>85</sup> 老舍，〈製作通俗文藝的苦痛〉，原載《抗戰文藝》，卷2期6（1938年10月15日），後收入老舍，《老舍曲藝文選》，頁10；老舍，〈談通俗文藝〉，原載《自由中國》，號2（1938年5月10日），後收入老舍，《老舍曲藝文選》，頁5。

<sup>86</sup> 王大真，〈新西遊記〉，《民眾周報》，卷1期1（1936年10月2日），頁36-41。

山林、行俠仗義的綠林豪傑，變成了一個不願委身日本特務機關的現代英雄。<sup>87</sup> 蹦蹦戲名劇《馬寡婦開店》，原來是描寫唐代狄仁傑進京趕考，遇上小孤孀的故事，<sup>88</sup> 民間無人不曉；通俗讀物編刊社深諳此劇流傳甚廣，於是便把馬寡婦的身世，從一個名門之後，換成了在九一八事變中喪生的義勇軍的遺孀，為報家仇國恨，計誘漢奸的故事。<sup>89</sup> 其他像《王二姐思夫》、《小寡婦上墳》等，<sup>90</sup> 也是一樣，都是民眾最熟悉、最感興趣的題材，可是其內容卻毫無「新酒」的成份；通俗讀物編刊社就換了個法子另外創作，說王二姐的丈夫正參與抗戰，小寡婦的丈夫是抗日死的，然後把他們的歌哭詞句做為《新王二姐思夫》和《新小寡婦上墳》的內容，這麼一來，銷路就大了。此外，通俗讀物編刊社還有一種更省便的做法，就是翻印舊劇。他們發現老百姓對戲劇是最有癮頭的，多數人買唱本，為的是消遣、娛樂，所以他們便大量翻印許多舊劇，並在舊劇之後附上一段新鼓詞，讓民眾在無意的消遣中，受到有意的教育。<sup>91</sup> 在「喚起民眾」的目標下，「舊瓶裝新酒」的創作路線，無疑延續了二十世紀初以來以「國民教育」為宗旨的啓蒙路線；<sup>92</sup> 而救亡抗日的思潮則刺激了通俗作品的轉向，把一部部描寫閨怨、俠義、果報、神仙鬼怪的篇章，改扮成宣揚民族大義、國家思想的國民讀本，利用舊形式導出新主題，藉此教育下層民眾。

整體來說，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寫作對象十分廣泛，他們寫領袖、政府、指揮官、士兵、戰役、民運、傷兵、婦女、難民、游擊隊、漢奸、偽軍、敵國民眾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豐富而多樣的通俗讀物推出之後，很受各界好評。1937年抗戰爆發，顧頡剛得知日人所列逮捕名單之中，赫然有他的名字，於是只好倉皇出奔，前往綏遠，並且把通俗讀物編刊社遷往綏遠工作。到了那裡之後，

<sup>87</sup> 李克，《竇爾敦破案》（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新刊第21種。

<sup>88</sup> 《（雜腔唱本）馬寡婦開店》，石印本，雙紅堂——戲曲 190，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sup>89</sup> 石鳴九，《新馬寡婦開店》（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新刊第24種。

<sup>90</sup> 《（雜腔唱本）王二姐思夫》，雙紅堂——戲曲 190；《（唱本 190 冊）大鼓段詞——小寡婦上墳》，雙紅堂——戲曲 189，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sup>91</sup> 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368-369。

<sup>92</sup>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pp. 174-175.



顧頡剛才知道他們所編寫的大鼓書、劇本和年畫等，在當地很受歡迎。<sup>93</sup>太原、蘭州等地甚至大量翻印他們所編印的鼓書，<sup>94</sup>或仿習他們的做法，成立類似的團體，編寫通俗民歌，作為抗敵的宣傳。<sup>95</sup>此外，因歌詠 1937 年 7 月由林彪指揮的平型關戰役而編寫的鼓詞《大戰平型關》，雖然遭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軍事委員會警告，卻因此受到八路軍的好評與同情。<sup>96</sup>由此可見通俗讀物編刊社在西北邊地推廣通俗讀物的成績。

#### 四、戰時歷史知識的建構與國民現代性的重塑

筆者目前可以掌握有關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出版品，大體可分三類：一是通俗讀物編刊社在戰前出版的定期刊物，分別是 1936 年 10 月 2 日創刊的《民眾周報》，同年 10 月 20 日創刊的《大眾知識》和 12 月發刊的《求生之路》；二是上海《申報》副刊的定期專欄「通俗講座」；以及第三類，也就是目前已很難看到，在當時卻有相當大影響力的甲、乙種叢書數種。以下的分析將主要集中在這些材料上。

這些刊物、出版品發行的時間雖然差距不大，但最初設定的讀者群顯然有所不同。如《民眾周報》最具多樣性，其所設定的閱讀群顯然較廣，即所謂的「民眾讀物」，內容與乙種叢書最為接近，不乏以「舊瓶裝新酒」創作的彈詞、鼓書、墜子和章回小說。最初由顧頡剛掛名擔任主編，第 2 卷以後改由徐炳昶接任，實際靈魂人物則是王受真、向林冰和李一非。而幾乎同一時期發行的《大眾知識》，在內容上就顯得中規中矩許多，其風格明顯與稍早在上海《申報》定期發刊的「通俗講座」接近，帶有濃重的學院性格，內容包括論文、傳記、書評和通信等；主編掛名為顧頡剛，實際負責人是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畢業，

<sup>93</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77。

<sup>94</sup> 顧頡剛，〈編印通俗讀物的經過〉，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 367。

<sup>95</sup> 蘭州當地青年設立類似團體，名曰「老百姓」，並請顧頡剛出任社長，出版旬刊。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序〉，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 4。

<sup>96</sup>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序〉，見氏著，《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 4。



時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編輯的吳世昌，以及當時在燕大、輔仁國學研究所、經濟系和英文系就讀的學生鄭侃熾、連士升、楊績、張秀亞等人。<sup>97</sup>另外，由山東省教育廳承印，北平通俗讀物編刊社主編的《求生之路》，<sup>98</sup>編刊內容明顯是以小朋友為對象，特別是針對讀過短期小學的學生，其文字內容更為淺白易懂，每期篇幅不超過二十頁。

顧頡剛在〈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論〉上曾說：「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只適合民眾，學生是不必要的。<sup>99</sup>他認為前者是通俗文化運動，後者是青年運動，兩者所需的形式和內容是不相同的。按照這個標準，《民眾周報》和乙種叢書實可看做是宣揚通俗文化的出版品，<sup>100</sup>而《大眾知識》和《申報》「通俗講座」則是以學生群為對象，<sup>101</sup>完全沒有任何「舊瓶裝新酒」的色彩。換句話說，這種雙軌並行的方式，雖然都以「通俗」為取向，但是在路線上還是可以清楚地區分出民眾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兩條線。顧頡剛始終相信「改造中國歷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眾的歷史觀念」，<sup>102</sup>戰前他努力開辦各種各樣的刊物，為的就是改造一般人的歷史觀念；《大公報》「史地周刊」專欄、《禹貢》半月刊、《民眾周報》、《大眾知識》等刊物幾乎同時間開辦。他曾不止一次對人說：「弟之野心，欲使中國上層階級因此刊（指《禹貢》）而認識中國，又欲使中國下層階級因通俗讀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國人。」<sup>103</sup>蓋欲同時改造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歷史觀念。

<sup>97</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59。

<sup>98</sup> 《求生之路》，於 1936 年年 12 月創刊，1937 年 5 月停刊，共發行 5 期。。

<sup>99</sup> 顧頡剛，〈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論〉，收入《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10。

<sup>100</sup> 1937 年 5 月《民眾周報》停刊後，直到 1947 年 5 月顧頡剛才又編印《卷》（第二期之後改名為《民眾週刊》），再度強調這是一份「給農民、市民、工人看的通俗刊物」，但其只辦了七個月後，就再度停刊了。見蘇州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民眾讀物社編，《民眾週刊》，卷 1 期 1 至卷 1 期 29-30（1947 年 5 月 24 日至 1947 年 12 月 14 日）；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332。

<sup>101</sup> 《大眾知識》出刊僅 12 期即停刊，戰後顧頡剛發起史地通俗叢書編輯社，出版《中國名人傳》及《中國歷史故事小叢書》等，即為此一路線之延續。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314；顧頡剛，〈編輯中國名人傳說明書〉，《上游集》（上海：合眾圖書館，1949），頁 7。

<sup>102</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00。

<sup>103</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37；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376。

即就下層階級的改造而言，顧頡剛亟欲傳達給下層民眾的，正是要認知自己在國家及國民上的屬性及定位，透過大量改寫的人物傳記、歷史故事、地理知識，告訴一般老百姓做爲一個「現代國民」應有的常識及應盡的義務。一如《民眾周報》徵稿啓事上所說，其目的在「啓發民眾知識，激發民眾向上意志，提高民族意識，培植民族自信力」。<sup>104</sup>在國難當頭之際，「把最大多數的民眾都叫醒來，大家來擔負『救亡圖存』的重擔子」。<sup>105</sup>

既以「救亡圖存」爲號召，通俗讀物裡最普遍的題材自然莫過於民族英雄人物，而這些民族英雄所包納的範圍異常寬廣，如《民眾周報》裡的史可法、沈雲英、楊黑虎、大刀王五、苗可秀，〈平倭記〉裡的戚繼光，〈順昌府大破金兵〉的劉錡，《大眾知識》裡的李廣、郭子儀，《民眾週刊》裡的林則徐、荀灌娘，〈夫人城〉裡東晉太守朱序的母親及其所率領的一批娘子軍，以及《申報》「通俗講座」裡的蒙恬、李廣、班超、祖逖、郭子儀、岳飛、鄭成功、馮子材；也有強調實業救國的張謇，寧可毀家紓難以救國的卜式，明代開邊英雄蕭雲仙，以及大漠女英豪訶額崙。晚清時期革命黨人或改良派人士，各自以「種族」或「國族」爲界所書寫的民族英雄系譜，<sup>106</sup>至此也隨著國族界域(boundary)的外移，共同敵人的改換，而匯聚一爐；具有高度抵禦外族意識的英雄人物，和能夠揚威異域、拓土開邊的民族英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裡，不分彼此，一同「爲國效力」。爲此，在英雄人物之外，忠臣與漢奸，也都在近代國家、國民統合的需要下，一系包納在形構國族意識的書寫體系之下，好比《民眾周報》裡〈澶淵盟〉的主角寇準、《大眾知識》裡的諸葛亮、王安石，《申報》「通俗講座」裡死不降清的閻應元、不肯出仕異族的傅青主、寧死不屈的方孝儒，都是典型的忠君愛國之士；而顧頡剛在《大眾知識》裡寫的負面人物石敬瑭、趙德鈞、趙延壽、杜重威，以及《民眾周報》裡〈真龍天子造天書〉的王

<sup>104</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徵稿啓事〉，《民眾周報》，卷1期1（1936年10月2日），頁68。

<sup>105</sup> 編者，〈民眾周報·開場白〉，《民眾周報》，卷1期1（1936年10月2日），頁2。

<sup>106</sup> 相關論述請參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3（2000年6月），頁107-143。

欽若，則是「人人得以唾面」的漢奸賣國賊。<sup>107</sup>忠奸之辨的對照，凸顯的不止是正反兩面的人物評價，更是國族疆界重劃過程中對於敵我、異己書寫的再造。

當然，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裡，不見得只有男子可以稱之為英雄，能報國的也絕不止於成人，婦女、小孩、官差、強盜，人人都是該被「喚醒」的對象，人人也都有報效國家的機會。蘇子涵的〈王義士〉，寫的就是明末的王姓官差，爲了營救不肯薙髮留辮的許博元夫婦，不惜犧牲自己；而深明大義的王妻，甚至願意冒名代替許博元之妻充軍，爲婦女立下忠義的楷模。<sup>108</sup>鄭侃嫫的〈王孫賈的母親〉，講的是戰國時期燕齊兩國相爭的故事，但她不寫齊宣王、不寫燕昭王，也不寫名將樂毅、鄒衍或劇辛，反而著眼於一個 15 歲的少年——齊國大夫之子王孫賈，描寫他在齊國只剩下莒和即墨二城時，如何在母親的鼓舞下，號召民間忠義之士四百多人，成功消滅了前來趁火打劫的楚國，挽救齊國於危亡之中。<sup>109</sup>在鄭侃嫫的描繪中，恃強凌弱的霸道，終不敵眾志成城的力量，深明大義的婦女、幼小羸弱的少年，一樣可以貢獻一己之力。同樣地，縣官的妻子、不識字的乞丐、善於製弓的匠人以及赤手空拳的百姓，<sup>110</sup>看似毫無抵抗的能力，團結起來卻可以匯聚巨大的能量，產生無比的勇氣。通俗讀物的作者們，極力在每一個故事中，營造強與弱、勝與負的對照，用以凸顯堅忍團結的志氣，和勇於對抗的精神，試圖以此「喚醒」民眾，勇於承擔時代的責任。

只是，同樣寫歷史人物，一樣是民族英雄，強調以青年學生爲對象的《大

<sup>107</sup> 王乃堂，〈真龍天子造天書〉，《民眾周報》，卷 2 期 6（1937 年 2 月 5 日），頁 17-24。此外，流傳甚廣的乙種叢書中，亦不時可見漢奸的題材，如方白，《槍斃韓復榘》（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新刊第 29 種；佚名，《活捉白堅武》（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乙種叢書，新刊第 10 種。

<sup>108</sup> 蘇子涵，〈王義士〉，《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 8，1936 年 5 月 7 日，第 4 張。

<sup>109</sup> 鄭侃嫫，〈王孫賈的母親——孩子懂得自強，齊國不亡了〉，《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 15，1936 年 6 月 25 日，第 5 張。

<sup>110</sup> 子人，〈李侃妻——一個勇於抗敵的婦人〉，《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 44，1937 年 1 月 14 日，第 3 張；韓德溥，〈行乞興學的武訓〉，《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 25，1936 年 9 月 3 日，第 5 張；季珍，〈晉弓人〉，《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 36，1936 年 11 月 19 日，第 5 張；蘇子涵，〈蘇州五義士〉，《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 8，1936 年 5 月 7 日，第 4 張。

眾知識》、《申報》的「通俗講座」，和以通俗文化運動為訴求的《民眾周報》、乙種叢書，二者的著墨方式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大眾知識》和《申報》的「通俗講座」，寫英雄人物著重的是一個人的行誼，強調的是他的功績、事業和情操，寫漢奸說的是他的惡行，以及罪不可逭、兩面不討好的下場。主旨明確，角色性格鮮明是共同的特色，淺白易懂，文字流暢則是最基本的要求，偶爾穿插對話體，以增加故事的通俗性，也是常用的手法。為顧頡剛稱許文筆「有民眾氣而無學生氣」的鄭侃嫫，<sup>111</sup>寫郭子儀和李光弼相忍為國，盡釋前嫌，寫郭氏孤身深入回紇大營，單騎退敵，筆調通俗，卻無一字無來歷。<sup>112</sup>前面提到的〈王孫賈的母親〉，除了生動緊湊的文字之外，鄭侃嫫也不忘在故事最後，清楚列出《孟子》、《戰國策》、《史記》、《列女傳》等書，表示這是一個出典有據的真實故事，使讀者產生共鳴。其他如王崇武寫訶額崙遭也速該搶婚時的哀怨，寫她帶領族人在幹難河畔生活的艱難，寫她怒責鐵木真兄弟的內鬩等，不到五頁的篇幅，用了七個註釋，強調全文是以《元秘史》為主要材料，還參考了《元史》、《元史譯文證補》、《蒙兀兒史記》、《新元史》、《蒙古源流》及《聖武親征錄》，更引王國維〈蒙古史札記〉裡的考證，以為徵信。<sup>113</sup>署名剛子所寫的〈李廣〉，讓人一看就可以感受到作者歌詠抵抗、抨擊苟安的用意，可是單單只為了解釋清楚文中的人名和事件，作者一口氣就引了八個註釋。<sup>114</sup>楊蓮生寫玄奘，寫的是玄奘取經、譯經的驚人毅力，行文之間作者卻不放棄說明佛教的基本教義，以及佛教東傳的過程，<sup>115</sup>少掉了學院式的考證，卻沒有省略傳達歷史事實的深意。

通俗讀物編刊社所寫的歷史故事，是給青年、學生、半知識分子看的，生動流暢之餘，也強調符合史實，選擇的歷史人物既有耳熟能詳的中外聞人，也有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然人物不論大小，必有所本。作者講述故事時，並不

<sup>111</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08。

<sup>112</sup> 鄭侃嫫，〈郭子儀〉，《大眾知識》，卷 1 期 9（1937 年 2 月 20 日），頁 30-37。

<sup>113</sup> 王崇武，〈訶額崙〉，《大眾知識》，卷 1 期 3（1936 年 11 月 20 日），頁 26-32。

<sup>114</sup> 剛子，〈李廣〉，《大眾知識》，卷 1 期 7（1937 年 1 月 20 日），頁 31-37。

<sup>115</sup> 楊蓮生，〈玄奘法師〉，《大眾知識》，卷 1 期 6（1937 年 1 月 5 日），頁 20-26。

加入太多個人的觀點，即使意有所指，敘事筆法也極為含蓄，意在言外之詞，往往留給讀者自己去領會。這些略帶文學性的筆調，雖然是通俗歷史故事的特色之一，但書寫對象顯然不是針對工農大眾或不識字的老百姓。

可是《民眾周報》和乙種叢書寫歷史、寫人物就不是這樣了，除了普遍用鼓詞、唱本、蹦蹦戲、皮簧等創作形式外，內容和敘述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民間原有的《十杯茶》、《十杯酒》、《花鼓詞》和《鳳陽花鼓》等小曲，說的無非是男女偷情、望君早歸等內容，<sup>116</sup>或是爲了諧韻，把歷史上的一些人物串成一句句像這樣的順口溜：

寫下一字一條街，姜太公穩坐釣魚台，關老爺本是磨豆腐，劉備西川打草鞋（噯呀噯子噯）；（又一句）寫下二字二條紅，常山上出了趙子龍，跨海征東薛仁貴，李靖王起兵入中原（噯呀噯子噯）；（又一句）寫下三字三條灣，趙匡胤偷稅去撞關，力大無存〔按：窮〕李存孝，蕭何丞相遇張良（噯呀噯子噯）；（又一句）寫下四字四面方，楊四郎失落在番邦，他在番邦為駙馬，不在朝中伴君王（噯呀噯子噯）；（又一句）寫下五字五盤根，楊五郎本是修行人，隋煬皇帝就把廣陵上，欺娘奸妹是昏君（噯呀噯子噯）；（又一句）寫下六句六面山，吳旻〔按：磷〕大戰仙人關，宋高宗金陵來接位，宮門掛帶小秦王。<sup>117</sup>

這類看似前言不搭後語的小調，只爲好唱易懂，沒有一點現實色彩；可通俗讀物編刊社用了「舊瓶裝新酒」的方法，大幅改寫這類作品，重編了像《抗日十杯茶》、《新花鼓》、《國難十二月》、《民國廿六年》和《抗戰歌謠》等，與現實攸關的歌謠，<sup>118</sup>這類歌謠有些一樣仿《十杯茶》的十段敘事方式，

<sup>116</sup> 《（雜腔唱本）十杯茶》，民國排印本，雙紅堂——戲曲 190；《（雜腔唱本）新出改良十杯酒》，雙紅堂——戲曲 190。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sup>117</sup> 《（雜腔唱本）新出花鼓詞》，石印本，雙紅堂——戲曲 190，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sup>118</sup> 佚名，《民國廿六年》（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新刊第 14 種；佚名，《新刊抗戰鼓詞目錄》，《抗戰歌謠》（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新刊第 11 種，頁 7；江枚，《抗敵時令歌謠》（漢口：生活書店，1938），上、下冊。顧頡剛在 1938 年到甘肅卓尼成德學校參觀時，見學生化妝演唱通俗讀物編刊社所編《十杯酒》等小曲，很受感



寫的卻是打漢奸、保中華的調。好比《抗敵時令歌謠》裡說：

一月水仙白帶黃，東洋倭子好瘋狂，奪了東北尚不夠，還要逞凶黃浦江。  
二月茉莉白如霜，東洋倭子多死傷，打了一月無勝敗，落得損兵又折將。

（註：「一二八」時敵將白川被炸身死）

三月桃花紅粉粉，倭子和我講和平，那知和平是騙局，轉眼又攻承德城。  
四月薔薇白又赤，倭子肚裡懷鬼事，東北演了傀儡戲，又向華北鬧自治。  
五月石榴紅如火，大家抵制東洋貨，倭子生意不能做，只怨軍閥野心多。  
六月荷花白帶紅，倭子國內本是空，失業工人成千萬，鄉村農民也鬧窮。  
七月鳳仙紅似火，倭寇居心實在野，七月八日蘆溝橋，宛平城內又遭劫。  
八月桂花黃如金，倭寇專喜動刀兵，進攻北平還不夠，八月十三又挑釁。  
九月菊花紅又黃，中華英雄好雄壯，機槍大刀一齊用，倭官倭兵齊驚慌。  
十月芙蓉紅帶紫，到處都是鬼子屍，五次總攻都失敗，三易司令無法子。  
十一月裡茶花紅，倭寇飛機到處轟，不管民房或醫院，屍橫遍地血成河。  
十二月裡臘梅黃，中國全面來抵抗，倭寇到處受打擊，怕見中華好兒郎。<sup>119</sup>

論者以為，這類從一月唱到十二月的唱本形式，早在六朝時就已出現，唐五代以後在民間大為盛行，更開啓了宋代「十二月鼓子詞」的先河，而這些出自民間的俗曲小調，更在清末知識分子、官紳、志士推展下層社會啓蒙運動之際，廣為運用。<sup>120</sup>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過去民間流傳的五更調、十二月曲，所述內容儘管活潑多樣，可是這種從一更嘆到五更，一月唱到十二月，或是像《十杯酒》、《十杯茶》、《花鼓詞》這類具有「數字」體裁的小調，多半是爲了配合聲韻節拍，區隔敘事段落，所以歌曲裡的時序、節氣、月份通常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反觀這時通俗讀物編刊社卻是依著時間順序，一月一月地表述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家國大事，寫下像《抗敵時令歌謠》這樣的詞曲。

更有意思的是，強調可以用大鼓墜子演唱的《國難十二月》，遠從中華民國

---

動。見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收入《甘青聞見記》，頁 68。

<sup>119</sup> 江枚，《抗敵時令歌謠》，上冊，頁 1-12。

<sup>120</sup>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頁 184-191。



國建立，推翻帝制行民主開始，一路寫到抗戰前夕；再從西安事變往下，一月一月地寫盡日寇侵華百態。由於全文內容太長，這裡只引一兩段以為說明：

正月擱下且不表，再把二月明一明：二月裡來龍抬頭，西安事變不罷休，眼看著和平將成就，又誰知那漢奸從中破壞火上加油，下邊煽惑眾兵士，上邊鼓動于孝侯。他想要挑撥離間起內亂，自己來把漁利收。這鬼計有些人們沒有看透，居然上了他的鉤。特務團長孫銘九，喪心病狂太混頭！二月三日大叛變，殺害了王以哲將軍命歸幽。從此後漢奸陰謀全暴露，和平成功國家元氣得保留。

七月裡來七月七，小日本蘆溝橋上動殺機，二十九軍男兒漢，要與此橋同休戚。一連打了好幾仗，打得那小鬼子卸甲丟盔直拉稀。最可嘆統兵將官沒有主意，事到臨頭還發迷。他跟那小日本開了談判，妄想和平誤軍機。誰知道中了敵人緩兵計，大軍入關來進逼。二十八日天上午，進攻南苑真緊急。趙登禹將軍竟戰死，五千健兒成了血泥。接連著北平天津都失守，實在令人太痛惜！幸賴我委員長決大計，領導著全國軍民舉起了抗日的旗。全面抗戰將發動，要和日本見高低。<sup>121</sup>

在《國難十二月》裡所敘述一月到十二月發生的事，沒有一件不和時事相關，像是三月的日船上海走私銅元事件，四月鄭州破獲董方城間諜案，五月天津日租界海河浮屍案，六月察哈爾北部國民自衛軍和蒙古軍政府交戰，以及八月的上海八一三松滬戰役，九月察哈爾、晉北失守，八路軍收朔縣、涞源，攻打平型關，十月蔣委員長發表國慶談話，十一月西北戰場失利，上海淪陷，十二月南京失守。大鼓詞裡每個月份都有確切的時間意義，緊緊扣合中日戰事裡每件動人心魄的史實，與舊日五更調、十二月曲裡可以一再反覆、重來、互換的時間秩序，有很大的不同。在這樣一種新的書寫形式裡，我們看到了通俗讀物編刊社一方面試圖翻轉老百姓過去的休閒趣味，同時也有意無意把一種具有時間先後脈絡和因果關係的線性歷史敘事方式，帶進一般大眾的腦海裡，讓民眾在

<sup>121</sup> 李克，《國難十二月》（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新刊第14種，頁1-7。

哼哼唱唱之餘，不知不覺間知道了國家的處境和國民應有的態度，一點一滴地改造民眾的歷史觀念。

此外，在歷史人物書寫方面，《民眾周報》或乙種叢書也有很不一樣的表現。如王澤民的〈平倭記〉是藉明朝嘉靖年間倭寇來犯，戚繼光率眾抵抗的故事，隱寓抗日之志。作者在文中不光寫日寇入侵時的殘忍，同時花了很大的筆墨描寫「家賊」汪直。這裡引一段鼓詞原文：

常言說沒有家賊也勾不進野鬼，  
這家賊的頭日本姓汪，  
他本是安徽省徽州人氏，  
姓汪名直一個大流氓。  
他手下帶了一批地痞無賴，  
駕船過海到東洋，  
先不過勾通外國做買賣，  
到後來公然成了海上王，  
招一些亡命之徒徐海、陳東做大將，  
勾結著倭奴頭目多田大島屎壳郎，  
佔據著豐前豐後通明巨甲三十六島，  
造了些兵船戰艦名叫大聯舫。<sup>122</sup>

在民族大義的前提下，通俗讀物的人物書寫通常顯得十分扁平，漢奸一定與英雄相對，抵抗與妥協誓不兩立，人物的性格必須有鮮明的對照，不能給讀者任何模稜兩可的空間。汪直在這段敘述裡沒有任何其他的形象，既不是一個帶領沿海流民出海貿易的商人，更不可能成為殖民海外的英雄，他只是一個地痞流氓。這篇鼓詞全文上下沒有一處提及日本，自然是因為受限於官方「敦睦邦交」的態度，可是不點明，又怕民眾不懂，所以日本倭寇在這裡成了「多田大島屎壳郎」，替日本人取個奚落的名字，開個無傷大雅的玩笑，通俗讀物在這裡，

<sup>122</sup> 王澤民，〈平倭記〉，《民眾周報》，卷2期5（1937年1月29日），頁24。

似乎又不必太過要求必得符合史實。

當然，寫抗戰、寫抵抗，絕不能只有將領，只有主帥，民眾才是抗暴的主角，失去了民眾群起響應的劇情，何以喚起民眾的抵抗之意。王乃堂的〈澶淵盟〉裡，力主宋真宗御駕親征的當然是寇準，藉著意志堅強的寇準說出：「水來土堰，兵來將擋是正理，國家有難不該怕死又貪生。誰勸我主不抵抗，這個人，就該問罪正典刑。」可是如果只有寇準一人絕對無法成事，所以御駕發兵到澶州之後，一定要來上一段：

百姓道旁呼萬歲，  
人山人海喊連天！  
這個說只說皇上是個膿包貨，  
誰想到竟敢領兵到邊關？  
那個說說他膿包一點也不錯，  
一聽打戰心膽寒！  
這個說他平常愛聽小人話，  
這些人勸他逃跑到南邊。

……

這個說假使皇上不抗戰，  
眾百姓也要起來保國權，  
團結民眾抵抗韃子，  
為國殺身理當然！  
那個說政府既然要抗戰，  
我們也要發民團，  
軍民聯合一起幹，  
殺敵衛國勇往直前！<sup>123</sup>

透過「這個說」、「那個說」，老百姓的抗敵意志才得以彰顯，政府不抵

<sup>123</sup> 王乃堂，〈澶淵盟〉，《民眾周報》，卷2期5（1937年1月29日），頁29-32。

抗的時候，民眾也可以自組民團義軍。鼓詞、唱本的書寫方法絲毫含蓄不得，「老百姓」是誰不必細究，是不是真實人物也無所謂，重要的是要讓民眾知道，抗敵不只是政府、軍隊的事，老百姓只要意志堅定，一樣可以從被壓迫者的角色中站起來。

這些描寫古代抵抗外敵入侵的歷史故事，雖然意在教導民眾領略古人行誼，進而起倣尤之心，但究竟不如現實戰役裡的抗敵故事來得直接，或更能引起讀者共鳴。九一八事變之後，參加東北民眾抗日自衛軍的苗可秀，《大鬧王家庄》裡因妻孥受辱，家毀人亡，毅然決定加入義勇軍行列的王大遠，《收商都》裡三十五軍傅作義部隊的陳世治、沈仲英，以及《血戰蘆溝橋》裡 19 歲殺敵無算的小伙子趙金標，<sup>124</sup> 容或不是全國知名的人物，但不妨礙其為民表率義的義行。曾經感動傅作義部隊的鼓詞〈百靈廟〉，作者野民大力歌頌的「眾健兒」，可以叫老張，可以叫老趙，可以是王長勝，也可以是李得標。<sup>125</sup> 這些面目模糊，性格又極其一致的人物，和傅作義、孫師長、張連長混同一氣，真假莫辨；在現實世界裡可以是任何一個鬥志高昂的勇士圖像，也可以是戰場上每一個為國捐軀的英雄縮影，<sup>126</sup> 透過說書人的演唱，歷劫歸來的戰士在這裡找到了撫慰心靈的知音。同樣地，描寫現實戰役的通俗讀物，民眾的面貌又比「歷史上的民眾」來得更為清晰、具體，不只士農工商一舉網羅，拉洋車的、叫花

<sup>124</sup> 佚名，《抗日英雄苗可秀》（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乙種叢書，決定版第 1 種；老白，《大鬧王家庄》（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決定版，新刊第 28 種；佚名，《收商都》（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乙種叢書，新刊第 4 種；佚名，《血戰蘆溝橋》，乙種叢書，1937 年 12 月。

<sup>125</sup> 〈百靈廟〉唱詞有云：「眾健兒熱血沸騰殺氣高，老張開言叫老趙，王長勝又叫李得標，奶奶的洋鬼子太胡鬧，他拿著俺們都當草包，……。」野民，〈百靈廟〉，《民眾週報》，卷 1 期 12（1936 年 12 月 18 日），頁 36。

<sup>126</sup> 沈松僑在探討晚清民族英雄系譜時也指出：英雄人物與過去民族的光榮事蹟，在族群團體邁向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往往成為強化群體的重要力量，然而這些民族英雄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蹟是否確切可考則無關宏旨。以此對照抗戰時期通俗讀物的歷史書寫，也有類似的情形，但凡能夠激發民族意識的當代／歷史人物——即便是虛擬的，在通俗歷史書寫裡經常被一再放大其英勇的形象，而此一現象以「舊瓶裝新酒」的創作類型中，又要比寫作對象是「中人」的通俗歷史書寫來得更為明顯。參見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的晚清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3，頁 85、87-88。

子、學生、看護隊、參戰團，誰都可以為抗日救亡盡一份心力，老百姓從鼓詞說書人的口中，看到了群眾，也看到了自己。

可是「喚起民眾」不能只是喚起民眾起來抗日，如果沒有足夠的現代知識、生活知能、國家概念、歷史常識，又如何能夠成爲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公民？通俗讀物編刊社成立之初，所出版的《打虎》、《白面客嘆五更》等，即是針對這方面加以著墨的作品。《打虎》一文說的其實是霍亂防治的辦法，霍亂(cholera)之日文漢字音讀爲「虎咧拉」，故以《打虎》爲名，吸引老百姓的注意。作者刻意創造了一個祁州城王家莊鬧霍亂的故事，先把感染霍亂時的各種症狀，如「吐瀉肚疼腿抽筋，舌乾口渴小便不順，手腳冰涼汗滿身。不思食來不思飲，通身無力頭發昏。十個病人倒有九個死，十家準有九家有病人」等，<sup>127</sup>編成好唱易懂的曲調，再藉著王家莊村民迷信求神問卜、誤信庸醫，造成疫情蔓延、全村遭難的劇情，提醒世人要有科學的觀念和正確的衛生常識，才能有效防堵霍亂的流行。其中告誡老百姓不吃生冷食物，安置紗門紗罩防蠅，妥善處理病人的嘔吐物，燒水、消毒，保持環境清潔等內容，活脫脫像一部基礎衛生教戰手冊。而《白面客嘆五更》則是一部改良大鼓詞，由一名染上鴉片毒癮的白面客，從一更嘆到五更，訴說自己無盡的悔恨。作者極有層次地不斷擴大、升高白面客的情緒，從愧對父母親朋、結髮妻子，嘆到對不起家國社會，如謂：「想人生百年刹那終須死，總應該成名立業不虛生，要學那五典三墳安家國，要學那六韜三略立勳功，要學那取義成仁真烈士，要學那捐軀報國大英雄。」白面客最後不忘提醒世人：鴉片、嗎啡、白面、金丹紅丸都是「洋人害我」的毒計，「苦害了多少同胞受折磨」，五更裡來月西沉，白面客輾轉神傷，感嘆：「我中華地大物博稱富庶，最可憐東北四省歸敵人，每個人應該挺身去爭戰，爲什麼還貪戀著大煙白面嗎啡針？身成病夫風吹倒，那能夠衝鋒陷陣殺敵人？」「只願舉國同胞速覺醒！下決心戒除嗜好作新民！」<sup>128</sup>此一文本巧妙地

<sup>127</sup> 小倉芳彥，〈通俗讀物編刊社の出版物——1930年代の抗日ペンフレット 11種〉，《調査研究報告》，期 17，頁 99-103。

<sup>128</sup> 小倉芳彥，〈通俗讀物編刊社の出版物——1930年代の抗日ペンフレット 11種〉，《調査研

把過去多數描寫女子閨怨的五更調，轉換成吸毒男子的悔罪書，將毒害和國難勾連一處，藉作新民的期許，帶出現代國民對國家的責任與義務。

隨著抗日情勢的轉變，通俗讀物編刊社更不斷修正早期作品中「救亡八股」的老套，<sup>129</sup>在歌詠抵抗、戰爭與英雄人物之餘，他們也適時加入各種現代知識，強化民眾基本的抗戰知能。為鼓勵民眾主動求知，通俗讀物編刊社不斷以武訓討飯興學的故事為範本，顧頡剛首先在《民眾周報》上刊出〈武訓討飯興學〉的大鼓詞，勸諭民眾不可忽視讀書，才是「救己救人」之道；即便像武訓這樣的小人物，不求做官，不求聞達，可是如果連基本的識字能力都不具備時，就連數數、計帳、貼春聯這樣的小事，都不免受人欺侮。<sup>130</sup>作者告訴老百姓，武訓花了三十年的光陰，忍受殘羹冷炙的討飯生涯，只為了「提倡教育掃除文盲」，實現替窮人興義學的梦想，所以「同胞救己救國要圖自強」，讀書識字才是第一樁要緊的事。這個故事後來一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以各種形式刊載，<sup>131</sup>甚至到了戰爭結束之後，又再度被米寶順選中，改編成歷史故事的形式，登在《民眾週刊》上，<sup>132</sup>加進了更為明確的時間、地點和故事情節，以「真人真事」的版本重行刊出。

此外，《民眾周報》自 1 卷 2 期之後，以連載的方式刊出說唱鼓詞〈賽金花〉，首度嘗試改編晚清名妓賽金花的故事。通俗讀物編刊社為了忠實呈現故事的真實性，還特別前往探訪已被人稱之為賽二爺的傅彩雲，<sup>133</sup>作者趙之中選

---

究報告》，期 17，1983 年 3 月，頁 111-112。

<sup>129</sup> 向林冰，〈通俗讀物編刊社的自我批評〉，收入顧頡剛，《通俗讀物論文集》，頁 83-84。

<sup>130</sup> 顧頡剛，〈武訓討飯興學〉，《民眾周報》，卷 2 期 3（1937 年 1 月 15 日），頁 31-40。

<sup>131</sup> 相隔數月，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又再以人物傳記的書寫方式，刊登在《申報》「通俗講座」上，見韓德溥，〈行乞興學的武訓〉，《申報》（上海），「通俗講座」，期 25，1936 年 9 月 3 日，第 5 張。抗戰爆發，通俗讀物編刊社轉進綏遠，出任分社長的段繩武，因軍旅生涯時期曾駐守山東，不時到武訓所辦的義學參觀，因此興起了表揚武訓精神的想法，並於 1933 年籌建河北新村時，興辦了武訓小學。綏遠分社後來還根據段繩武所提供的資料，繪製編印了《武訓興學》等畫傳、連環畫和年畫。郭敬，〈為悼念顧頡剛先生——記北平通俗讀物編刊社和綏遠分社〉，收入《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114-117。

<sup>132</sup> 米寶順，〈行乞興學的武訓〉，《民眾週刊》，卷 1 期 2（1947 年 5 月 31 日），頁 6-9。

<sup>133</sup> 王煦華，〈顧頡剛先生學術紀年〉，收入《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下冊，頁 1038。1934 年 5 月 4 日顧頡剛特別到劉半農住處，相約同訪年已六十的賽金花，謂之美人遲暮。見顧頡剛，



擇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以說詞、唱詞相間的方式、流利的筆調，把一段原本充滿淫豔色彩的民間傳說，改編成一個具有現代思想的歷史故事。首先，作者藉著傅彩雲被迫為娼的情節，告訴大眾「娼妓生活，本來是社會上一件極端不合理的現象，也是在這男女不平等社會裡應有的結果」，「希望大家認清這種不合理的制度，想個解決的辦法」。<sup>134</sup>寫到傅彩雲的第一任丈夫洪鈞時，作者充份利用這個機會大力教育民眾，告訴讀者洪鈞原不過是個只會搖頭晃腦、死讀書的糊塗狀元郎而已，如果不是同鄉前輩馮景亭指點他「留意世界大勢和外國的學問」，洪鈞仍然相信「五經四書就能打退外國兵」。只是這樣「半通不通的外交人才」，在清朝末年已屬難得，<sup>135</sup>所以才會在當時外派出使俄、德、奧等國。

趙之中在第四回「觀海景引起求知慾，談時事呼出反抗聲」中，藉洪鈞帶傅彩雲北上赴京述職時，在船上大談世界地理，向民眾說明歐、亞、美、非、大洋洲的位置，並以世界近代史闡明「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的民族進化觀；當然，這中間不免提到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批評日本「趁火打劫」，侵略中國。<sup>136</sup>作者還藉傅彩雲之口，向洪鈞追問一句「中國既是天朝大國，從什麼時候起，才受外國人的氣呢？」導出了一段中國近代史。在這段中國近代史的敘述中，洪鈞綜述鴉片戰爭以後，領土割讓、關稅不能自主，丟失了外藩、領土的過程，口吻完全不像一個「不知世界大勢」的腐儒，而其批評清廷辦外交、設同文館、練海軍和慈禧挪用軍費大修頤和園的話語，更是明顯地在傳遞一種後設的現代化史觀。<sup>137</sup>第五回以後，作者描寫洪鈞出使前夕，李鴻章來訪，一面要求洪鈞儘量拉攏俄國，以抗衡日本，一面希望洪鈞在德國能多購買一些新發明的科學器物，好給慈禧放在頤和園裡玩賞，<sup>138</sup>用此塑造李鴻章顛預迂腐的形象；而「學

---

《顧頤剛日記》，卷3(1933-1937)，頁185。

<sup>134</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二回），《民眾周報》，卷1期3（1936年10月16日），頁45。

<sup>135</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三回），《民眾周報》，卷1期4（1936年10月23日），頁39-40。

<sup>136</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四回），《民眾周報》，卷1期5（1936年10月30日），頁48-49。

<sup>137</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四回），《民眾周報》，卷1期5，頁50-51。

<sup>138</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五回），《民眾周報》，卷1期7（1936年11月13日），頁39。

商各界代表」一同來見時，作者更巧妙地利用老紳士閉關自守的主張，和商界代表想要依賴大國以圖自保的言詞，一氣烘托出守舊派和苟安派的心理。至於洪鈞提出想要藉出使俄國之際研究西北地理的構想，作者也沒有好評，反而說是「連本國的情形都認識不清，怎能談到調查別國的國情呢？」作者最後告訴讀者，只有那位把清朝政府臭罵一頓的年輕「學界代表」，稍具一點「進步」思想，而這種進步思想「在那時雖然得不到大多數人的了解和擁護，可是從那時以後，卻漸漸的發榮滋長起來，終於得到了辛亥革命的結果。」<sup>139</sup>

〈賽金花〉的故事連載了八期之後，實際上並沒有寫完，可能因為篇幅過長的關係，後來也不見單行本發行，可是作者意圖在文中傳達的現代化史觀卻極其鮮明，趙之中藉著家喻戶曉的故事，大量翻新內容，試圖讓民眾在不知不覺中了解世界地理、中外關係，和一段由國恥、國難所串聯起來的中國近代史。在細部的描述上，他更不放過任何可以利用的情節，向民眾宣示一種新的道德觀念和民族思想；像是作者藉著傅彩雲和洪鈞元配的緊張關係，批判舊禮教，<sup>140</sup>或是透過二人途經新加坡購物時，發現當地住民雖同為中國人，卻無法了解彼此語言，說明方言所造成的隔閡，乃是民族不能團結的要因，<sup>141</sup>類此情節，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橋段。而這些元素又無一不是通俗讀物編刊社所欲形塑現代國民的特質，透過通俗歷史讀物的撰寫及說唱藝人的傳唱，希望一點一滴地傳播給庶民大眾。

## 五、餘論——內外困境

通俗讀物編刊社自 1933 年成立三戶書社開始，學術同儕多表觀望的態度，<sup>142</sup>社會上的接受度也不很高，平津一帶幾乎找不到願意承印的書商，後來

<sup>139</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六回），《民眾周報》，卷 1 期 8（1936 年 11 月 20 日），頁 44-46。

<sup>140</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四回），《民眾周報》，卷 1 期 5，頁 45-46。

<sup>141</sup> 趙之中，〈賽金花〉（第八回），《民眾周報》，卷 1 期 11（1936 年 12 月 11 日），頁 38-41。

<sup>142</sup> 顧頡剛曾經表示，他辦下層階級的刊物「不知為什麼，向我表同情的只有青年，而前輩與同輩則皆視若無睹，甚且目笑存之。」見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237。

只好往上海方面找去。<sup>143</sup>顧頡剛曾感嘆：「民眾自身無求智識的興趣，真束手矣！」<sup>144</sup>不過，1930年代通俗讀物的編印和推廣，自始就與國難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喚起民眾」的目標，也說明了民眾此時確實處於相對被動的角色。通俗讀物編刊社缺乏民間的挹助，自然只能求助於政府機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補助款，<sup>145</sup>以及個人的捐獻，運作過程不時出現各種艱難。顧頡剛多次抱怨教育部的社會教育經費，明明編列有改良民眾讀物的預算，卻不願意給予補助，<sup>146</sup>1936年甚至一度因陳立夫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內有共產黨員，而差點宣告關閉；<sup>147</sup>出版刊物不斷宣揚抗日的主張，也使該社的編刊路線始終受到日本刁難和政府當局的警告。《民眾周報》3卷8期一萬多冊已經編印完成，卻在上海遭巡捕房查抄，只因內容「妨礙邦交」無法上市，最後不免遭到停刊的命運；<sup>148</sup>而《大眾知識》從第6期開始就出現了動搖的跡象，勉強支撐到12期之後也不得不停刊。顧頡剛表示：「過去這六期是費了很大力氣掙扎出來的，當然，假使我們願意放棄我們原來『不合時宜』的主張，經濟的困難會立刻解除。」<sup>149</sup>這裡所謂「不合時宜」的主張，指的就是他們堅持抗日的態度。定期刊物相繼停刊之後，他們只能靠繼續編印通俗讀物支持運作。戰爭爆發後，標舉抗日之名雖然不再受到政府干預，但補助款一樣難以取得，加以戰爭期間通貨膨脹、生活書店被封，社員星散，通俗讀物編刊社至1940年僅存其名，教育部、行政院의補助款雖持續領到1944年，但實際上已是名存實亡了。<sup>150</sup>

個人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在戰爭中期不得不結束的原因，可以從內外兩方面的困境來談。在外部困境上，積極抗日的主張所導致上述經費不足、社團運

<sup>143</sup> 1936年8月4日上海亞東圖書館承諾顧頡剛，每月可印通俗讀物二十萬字，及半月刊每期七、八萬字。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513。

<sup>144</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125。

<sup>145</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380。

<sup>146</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442、501、504。

<sup>147</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47。

<sup>148</sup> 查抄時間在1937年5月19日。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644、648。

<sup>149</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73。

<sup>150</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301。

作困難，只是表面原因，實際上左傾的抗日路線，才是通俗讀物編刊社始終得不到政府及國民黨中央黨部支援的重要因素。這裡牽涉到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就是包括顧頡剛在內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成員們的政治的立場，以及顧頡剛個人與通俗讀物編刊社的關係，這些問題在《顧頡剛日記》出版後，有了一個比較清楚而完整的輪廓。

一如前面所討論的，19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和通俗讀物的編寫，實與九一八事變之後的國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即就顧頡剛個人而言，通俗讀物的編寫，雖不能說和他早期的研究脈絡毫無聯繫，但在他的生涯規畫中，通俗讀物編刊社卻不屬於他預期中的學術事業，而是歸類在「社會服務」項目之下。<sup>151</sup>國事蝸蟻，原來躲在書齋象牙塔中的學術人，很難再做「自了漢」，<sup>152</sup>挺身而出鼓吹抗日，本是極自然的選擇，可偏偏國共雙方皆把抗日當成政治角力的戰場，支持與反對的背後，牽涉了複雜的政治因素。例如三戶書社成立之初，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對於通俗讀物的編刊路線原是大表贊同的，<sup>153</sup>然而隨著熱河淪陷、長城戰役、綏遠戰役的開打，通俗讀物編刊社所大力歌詠的二十九軍宋哲元部隊和駐守綏遠的傅作義部隊，<sup>154</sup>在中原反蔣大戰中，原為馮玉祥和閻錫山舊部，與中央軍的關係本就不睦，加上抗日主張不同，力持抗日立場的通俗讀物編刊社，當然難以得到來自中央的經濟奧援。相對於此，中國共產黨卻因同情抗日與反蔣的立場，而與站在第一線上的二十九軍和傅作義部隊產生惺惺相惜之情，於是連帶地通俗讀物編刊社就成為其拓展抗日宣傳版圖的重要陣地。

---

<sup>151</sup> 1934年6月30日，顧頡剛在日記上檢討其生活內容時，很明確地將通俗讀物編刊社、技術觀摩社、引得校印所、黎明中學、樸社、景山書社等所擔任的職務，當成是社會服務的範圍。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204。

<sup>152</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667-668。

<sup>153</sup> 據顧頡剛所言，王世杰於1935年還一度想找顧氏前往南京編通俗讀物。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3(1933-1937)，頁92、87、365-366。

<sup>154</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歌誦馮玉祥舊部在抗戰中表現的作品有：《宋哲元大戰喜峰口》、《趙登禹南苑殉國》、《血戰蘆溝橋》、《郝夢齡抗敵殉國》、《飛將軍》、《戰平郊》、《大戰天津衛》等；而《收商都》、《張子青誘敵》、《張仰賢大戰百靈廟》等則是歌詠傅作義部隊之作。

在此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一概將主張抗日者打為左傾分子，顧頡剛也不斷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或謂顧氏左傾，或謂其為共黨分子包圍之說甚囂塵上。1936 年底傅斯年自南京來，私下告訴顧頡剛，他來北平一星期，聽見北大、清華說他壞話的至少三十人，說的大多都是思想左傾和受共產黨包圍之類的話，<sup>155</sup>傅斯年為此也忍不住勸他，勿「助冀察以罵中央」。<sup>156</sup>幾個月之後，北平學界甚至有謠言傳出，說西安事變是顧頡剛所鼓動的。面對這些謠傳，顧頡剛憤懣異常，認為是「曾參殺人」之謠，「直將坐予以槍斃之罪矣！」對顧頡剛而言，辦通俗讀物是「不忍民族之覆亡」，<sup>157</sup>無關乎政黨，戴上一頂左傾的大帽子，乃不可承受之重；可客觀情勢和現實觀感卻未必如此簡單，對國民黨及中央政府而言，顧頡剛私訪張學良、楊虎城，<sup>158</sup>接受孫科、馮玉祥等人的金錢援助，或是歌詠宋哲元、張自忠、傅作義部隊，以及刊行馮玉祥詩文等作為，<sup>159</sup>無異於拿了中央的錢，卻「助冀察以罵中央」，非但沒有為國民黨的民眾政策宣傳，反而間接幫助了共黨勢力的坐大。

不過，話說回來，顧頡剛雖然極力想要撇清自己的左派色彩，可是環顧通俗讀物編刊社的重要成員，國民黨的指控也非空穴來風；主導通俗讀物編刊路線的三個人王受真、李一非和向林冰不用說，皆與共產黨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王受真晚年回憶，社員大約十五、六人，這些人的來歷顧頡剛極少過問，充分授權給他們自己安排；所以社員中有些人是因為投稿到社裡，從特約撰稿人變成了正式職員，有些則是因為大批訂購了編刊社的出版品，被認為志同道合而吸收進來，有些社員即使不是共產黨員，也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成員，<sup>160</sup>或是

<sup>155</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 (1933-1937)，頁 577。

<sup>156</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 (1933-1937)，頁 599。

<sup>157</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 (1933-1937)，頁 518。

<sup>158</sup> 1936 年 11 月 15 日顧頡剛與徐炳昶、李書華等人往訪西安，曾與張學良、楊虎城、邵力子等人同宴。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560。

<sup>159</sup> 《民眾周報》刊有馮玉祥詩文，而乙種叢書亦曾以單刊方式發行馮玉祥的《抗戰詩歌》。1937 年 1 月顧頡剛赴孫科宴中，孫允諾援助通俗讀物編刊社每月 500 元。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644、579-581。馮玉祥，《馮玉祥抗戰詩歌》（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乙種叢書，新刊第 11 種。

<sup>160</sup> 如《杜泉死守杜家峪》的作者趙伯庸，即是三戶書社時期因投稿而加入編刊社行列的；後來擔



左傾態度明顯的年輕人。如燕大英文系學生楊績，1930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北方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平分盟的簡稱）成立後，被推舉為常務委員，在校期間即已積極參與燕京大學左翼社團的組織工作，畢業後到了上海，又進入左聯上海總盟，1936年重回北平，才擔任《大眾知識》的編輯。《大大小小一齊幹》的作者馬昌實，是陶行知的得意門生，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共產黨，從1928年開始參加共產黨在皖北的地下活動，1936年回到上海，在生活教育社擔任編輯工作，抗戰期間編過《抗戰兒童報》和《兒童晨報》等刊物。此外，像《八路軍出馬打勝仗》的作者楊晉豪、為《大戰平型關》畫插圖的邵恆秋、寫《梨膏糖》的榮千祥、《八百好漢死守關北》的作者趙景深等，<sup>161</sup>當時皆是具有左傾思想的文藝青年。

這些人的集結，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為了抗日，國民黨在戰前打壓抗日言論的做法，反而刺激他們轉而同情共產黨的處境，對於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革命論所抱持的理想色彩，他們也有一定程度的認同；只是這些態度和主張無一不與國民黨相左，所以即使七七事變之後，「抗日」不再是中央政策上難以啓齒的禁忌話題，可是通俗讀物編刊社從戰前歌詠二十九軍、五十九軍奮勇殺敵的故事，轉而愈來愈露骨地直接歌誦八路軍在抗戰中的英勇行徑，並且一再形塑中央軍軍紀敗壞、八路軍紀律嚴整的形象，<sup>162</sup>就再也不是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

---

任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的郭敬，則是大批訂購了出版品，並對編刊社的工作產生濃厚的興趣。王真，〈記顧頡剛先生領導下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收入《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104-106。

<sup>161</sup> 邵恆秋，〈顧頡剛創辦通俗讀物編刊社所起作用〉，收入《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120-121。

<sup>162</sup> 蘆溝橋事變後，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寫作題材明顯地轉向，由先前歌誦二十九軍轉而歌誦八路軍戰績，如《大戰平型關》、《八路軍出馬打勝仗》、《陽明堡火燒飛機場》、《丁方上前線》等，皆是其一印再印的刊本。這類作品許多以虛擬小人物為主角，以現身說法的語氣，描寫「有些個抗日部隊」不是隨意抽壯丁，就是擾民劫舍，用以映照八路軍所到之處軍民一家，萬民擁戴的形象。如署名方白所寫的《大戰平型關》有謂：「從前家家躲軍隊，如今不躲也不藏，……都只為八路軍的紀律強。公買公賣不欠賬，好借好還有主張，從那裡來的還往那裡放，弄壞了東西要賠償，未曾說話面帶笑，好言好語來商量。」見方白，《大戰平型關》（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乙種叢書，新刊第13種，頁3。《八路軍出馬打勝仗》也是歌誦平型關戰役的作品，與《大戰平型關》有類似的故事結構，描述出自瀋陽的虛擬人物老朱，先投效廿九軍抗日不成，轉赴陝北投紅軍，參加八路軍打勝平型關一役的故事。見楊晉豪，《八路軍出馬打勝仗》（漢口：通俗讀物編刊社，1939），大眾讀物乙種之3。有關平型關戰役最初涉及毛澤東與八路軍領袖之間的路線之爭，以及中共如何自抗戰初期開始，建構八路軍與平型關戰役

央所能容忍的了。經濟無法自立，社員生活無以為繼，通俗讀物編刊社的滅亡，也只是早晚的事。

事實上，顧頡剛對於通俗讀物編刊社內部的情形並非一無所悉，他自己也很清楚問題是出在自己的個性和盛名之累，才使其陷入進退維谷之境。1937年顧頡剛在抗戰爆發，從北平出逃綏遠之際，做了一番沉重的檢討，很能說明這種心情，他說：

余以愛才，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敗事亦在此。蓋大多數之青年為衣食計，就余謀出路，使余不得不與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為我有意造自己勢力，於是「顧老闆」、「顧大師」之綽號紛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圖謀，無如未得社會之信仰，力不足以號召，謀推戴余，為彼等之傀儡，成則彼得其利，敗則我受其禍，於是「顧頡剛左傾」、「顧頡剛為共黨包圍」之傳說宣揚於道路間矣。<sup>163</sup>

對顧頡剛來說，教育民眾是其難捨的社會責任，但實際上卻沒有太多時間兼顧於此，放任且信賴部屬，似乎成了他唯一的選擇。顧頡剛並不諱言自己成了傀儡，多少說明了他在通俗讀物編刊社所處的位置及其真實意態。從《顧頡剛日記》裡可以清楚地看出，學術志業始終是顧頡剛念茲在茲的選擇；七七事變後，面對「國土大塊分裂」，文化前途堪虞，顧氏雖憂心忡忡，可是聽聞自己登上了日人緝捕的黑名單，不得不出逃時，卻反而慶幸自己有了了一個可以「跳出重圍，別尋遨翔」的機會，內心的矛盾和衝突，以及亟欲擺脫名實不符之累的心情躍然紙上。

只是事情並不如預期，顧頡剛抵達蘭州之後，八路軍派人與之聯繫，顧氏對此顯得既驚訝且惶恐，一方面擔心一旁的人因此造謠，<sup>164</sup>陷其於不義，一方

---

的集體記憶之研究，可參考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1（2006 年 3 月），頁 131-186。

<sup>163</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673。

<sup>164</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1933-1937），頁 748；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 281。這兩條史料對於此一段記載略有不同，後者將《顧頡剛日記》裡「適農校校長王爾敲在，其將為我造謠言乎？」一段話節略，語意大有不同。

面卻又十分相信「民眾教育」之事，「惟彼方能識之，亦惟彼方敢爲之」。這種態度和他多次想要「跳出社會運動」的圈子，卻不忍眼見社員孤軍奮戰的矛盾，可說是極其一致的。<sup>165</sup>而這種來回的拉鋸，也令顧頡剛終究不得不放手通俗讀物編刊社的事務。1938年4月顧頡剛出任中英庚款董事會之補助西北教育設計委員，因不堪李一非總是把他「牽入思想問題之漩渦」，<sup>166</sup>使他進退維谷，只好狠下心來，結束了客串六七年的「傀儡生活」，<sup>167</sup>正式辭去社長之職，在此之後，他就極少再過問通俗讀物編刊社具體的事務。

《顧頡剛日記》的披露，幫我們還原了不少顧頡剛與通俗讀物編刊社的關係，相對釐清了一些顧頡剛當時複雜的心態，對於理解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出版及編刊路線，也有了較為清晰的輪廓。此處姑不論通俗讀物編刊社到底貫注了多少顧頡剛的意志與觀念，唯可確定的是顧氏當時的心態和遭遇，應是很多1930-1940年代知識分子的縮影。顧頡剛不滿有人拿《大戰平型關》鼓詞，當作他是「異黨」的鐵證，甚至曾語帶賭氣地說：「抗戰之中，國共合作，八路軍固由共產黨統率，其軍隊非屬國家者乎！平型關之勝利獨非吾國家之勝利乎！今日指予爲共產黨，不足以殺我，曷不鍛煉我以漢奸罪耶！」<sup>168</sup>這樣的例子絕非個案，前面提到的老舍，在從事「舊瓶裝新酒」鼓詞創作時，遭到一樣的批評和質疑，老舍憤而反唇相譏，認爲大敵當前，對方的說法根本是「分裂抗日戰爭」。<sup>169</sup>也許對很多身處國難的學人而言，國民黨硬是把他們的愛國熱忱說成是「異黨」，或是刻意區分國共之間的抗日壁壘，反倒是致使他們倒向共產陣營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對通俗讀物編刊社來講，又何嘗不是如此！

<sup>165</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4（1938-1942），頁282、345。

<sup>166</sup> 事發的真正原因是，1937年8月顧頡剛接受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委託，和陶孟和、戴樂仁、王文俊等人，前往甘、青、寧三省考察西北教育，任補助西北教育設計委員。次年4月李一非自蘭州前往臨洮找顧頡剛商討社務，並向中英庚款董事會請求補助，但申請地址卻留的是補助西北教育設計委員會會址，此舉使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杭立武生疑，通俗讀物編刊社蘭州分會只好因此結束，顧頡剛辭去社長之職，以擺脫嫌疑。見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83-284。

<sup>167</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4（1938-1942），頁59。

<sup>168</sup>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頁284。

<sup>169</sup> 甘海嵐編撰，《老舍年譜》，頁130。

如果說國共兩黨對於抗日領導權之爭，為通俗讀物編刊社帶來了無可避免的外在困境，那麼 1930 年代以來有關「新舊形式」的論辯，所涉及的就是文化界對於民族特殊性和普遍性認同的另一種爭持；而此一爭持，多少也造成了通俗讀物編刊社在內部的創作路線和編刊對象上難以突破的困境。

如同前面所討論的，通俗讀物編刊社以「舊瓶裝新酒」的理念推廣通俗讀物的過程，實際上是企圖把大眾文化和傳統聯繫起來的一種做法。他們修正了五四以來對於傳統文化所採行全盤批判的態度，希望從更廣闊的民間文化中，吸取更豐沛的能量，積極創造更具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然而此一創作理念，到了 1939 年初，在延安發起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中，卻受到來自各方極大的批評。這場論辯持續將近兩年，陸續在重慶、桂林、昆明、成都、香港、上海等地延燒，引起許多政治立場不同的文化界人士，對於「文藝大眾化」路線的大規模討論。在此過程中，較早嘗試「文藝大眾化」路線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即成了各方批評的焦點。不少批評者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所提出的「舊瓶裝新酒」的主張，太過注重以民間形式為中心，並且把「舊形式」當成是大眾化的唯一途徑，造成許多作品出現了生搬硬套的現象。而通俗讀物編刊社強調用大眾所熟悉的舊形式，「灌注」新國民意識的主張，也被視為是一種知識分子俯身低就的態度，並非真的從一般大眾的角度創作與思考。<sup>170</sup>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理論大將向林冰，在這場有關「民族形式」的論戰中成為眾矢之的。他在 1940 年發表有關「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系列文章中，一再為「舊瓶裝新酒」的創作路線辯護。首先，他歸結了當時對於「民族形式」討論的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民族形式」必須以五四新文藝為起點，<sup>171</sup>一是如

<sup>170</sup> 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重慶），「戰線」，1940 年 3 月 24 日，第 3 版。有人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大眾化路線，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把大眾當成被教育的對象，而非積極地加入大眾的行列，從大眾的角度創作與思考，因此他們的創作充其量只能稱之為「化大眾」，而非「大眾化」。有關此一方面的討論，請參見王愛松，〈「大眾化」與「化大眾」——三十年代一個文學話語的反思〉，《南京大學學報》，1996 年第 2 期，頁 27-28；

<sup>171</sup> 劉忠，〈中國現代文學話語形式的三次論爭〉，《社會科學研究》，2004 年第 6 期，頁 137-143。此一主張可以葛一虹為代表。見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新蜀報》（重慶），「蜀道」，期 29，1940 年 4 月 10 日。

通俗讀物編刊社所主張的，「民族形式」必須要以「大眾所喜見樂聞的民間文藝形式」為起點。<sup>172</sup>在向林冰的觀念裡，「民族形式」這一命題並不是個「既成的存在」，而是一個尚在發展的過程，因此民間文藝雖然帶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殘餘，但它卻也是封建社會矛盾的產物，而最終也將是崩解封建社會的利器。他說：

新質發生于舊質的胎內，通過了舊質自己否定過程而成為獨立的存在。因此，民族形式的創造，便不能是中國文藝運動史的「外鑠」的範疇，應該以先行存在的文藝形式的自己否定為地盤。<sup>173</sup>

向林冰以一種極為辯證的方式，斬釘截鐵地強調民族的新形式絕不能以五四新文藝為中心，因為五四新文藝乃是一種「缺乏口頭告白性質」，和「畸形發展的都市產物」，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舞女，政客及其他小『布爾』的適切形式」，所以在創造民族形式的起點上，頂多只能居於「副次」的位置。<sup>174</sup>相反地，「存在決定意識」，向林冰認為一切的「喜聞樂見」當以「習見常聞」為基礎，民間形式由於是大眾習見常聞並切合文盲大眾口頭文學的形式，所以反而是創造新「民族形式」的鎖鑰。

從 1930 年代新舊形式的討論，到 1940 年前後有關「民族形式」的論戰中，各方的觀點及勝負始終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個人無意對此多做討論，我只想指出在這場有關舊形式是否可以成為「民族形式」起點的論辯中，無論是主張民族形式應以五四新文藝為中心，還是以民間文藝為中心，其背後所牽涉的，其實是文化界對於現代民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認同的問題。<sup>175</sup>值得注意的

<sup>172</sup> 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重慶），「戰線」，1940年3月24日，第3版。

<sup>173</sup> 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重慶），「戰線」，1940年3月24日，第3版。

<sup>174</sup> 此處為向林冰借用黃繩的說法，說明五四新文藝缺乏大眾欣賞的基礎。見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重慶），「戰線」，1940年3月24日，第3版。

<sup>175</sup> 郭沫若在〈「民族形式」商兌〉中即曾提到：「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乃是受到蘇聯的影響，不同的是，蘇聯「民族形式」論辯的目的，是要以「內容的普遍性揚棄民族的特殊性」，但中國對此問題的討論，則圍繞在「中國化」和「大眾化」的問題上，企圖以「民族的特殊性以推進內容的普遍性」。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原載《大公報》（重慶），「星期論文」，1940年6月9日，第2版、6月10日，第3版。後收入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



是，在民族主義的語境下，通俗讀物編刊社及「舊瓶裝新酒」的創作理論，重新肯定了民間文藝所代表的「舊形式」，並試圖以此與「傳統」相連，用以對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不斷向西方傾斜的文藝色彩。我們於此再度看到了「傳統」被賦予一種全新的形象，它不再是五四時期所批評的山林文學，也不再泛指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所欲打倒的舊道德和舊文化；「傳統」的定義隨著「現代」意義的轉化而出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此之前，傳統是保守的象徵，此時，傳統卻代表了蘊蓄巨大能量的民間文化，甚至肩負了再造新民族的重責大任。

當然，這樣的轉變絕對和抗日動員的語境相關，向林冰說：「民族形式的提出，是中國社會變革動力的發現在文藝上的反映」，而「人民大眾」則是中國社會變革的動力所在。<sup>176</sup>爲了戰爭動員，人民大眾的地位因此提昇，連帶地，人民大眾的力量、喜好、文化表現形式，也因而比城市小資產階級來得有份量、有價值、有特色。五四時期爲求和西方接軌而一再宣揚的普世價值，到了戰爭年代，彷彿都成了阻礙民族發展自我特色的絆腳石。戰爭所需的是敵我立判、旗幟鮮明，誰具有更高的辨識性，誰就能出任民族主義的代言人；所以只有少數人能懂，並曾積極尋求現代文學表現形式的五四新文藝，當然只能敗下陣來，由那個過去從不被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青睞的民間大眾文藝取得代言的寶座。

在民族主義的語境中，民族特殊性的強調顯然高過了現代性的追求，爲了戰爭動員，沒有人再敢輕忽老百姓的力量，而民間文藝也成了最具特色的傳統文化。通俗讀物編刊社不斷致力「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式，爲的就是要以老百姓所熟悉的舊形式，灌注新國民的意識，使之成爲一個具有現代思想觀念的新國民。只是，通俗讀物編刊社一方面在形式上，堅持採取傳統民間文藝的表現方式，一方面在創作內容上，卻又希望可以將現代國民應有的知識傳達給民眾，在形式與內容之間，通俗讀物編刊社其實是交雜著對民族特殊性的要求，以

---

文學出版社，1992），文學編，卷19，頁31-47。

<sup>176</sup> 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重慶），「戰線」，1940年3月24日，第3版；向林冰，〈封建社會的規律性與民間文藝的再認識——再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一〉，《新蜀報》（重慶），「蜀道」，期101，1940年4月21日，第4頁。

及對現代性普遍價值的認同；這樣的矛盾與衝突，其實多多少少反映了他們對於創作形式和創作內容之間的聯繫，存在著一種想當然耳的推論。好比向林冰說：

民間形式，只在其與封建內容相結合（如過去中國民間文藝），或與帝國主義思想相結合（如目前日寇在游擊區的通俗宣傳品）的場合，才是反動的；如果和革命的思想結合起來，就是有力的革命武器。<sup>177</sup>

對向林冰而言，形式是由內容來決定的，所以只要內容正確，形式必跟著轉化。<sup>178</sup>這樣的推論，仍然是把「舊瓶」和「新酒」當成是兩個互不相屬的敵體，新酒的內容為何，是由知識分子決定的，舊瓶只是工具；一般大眾的思想和趣味完全是受知識分子被動的牽引，兩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轉化上的困難。對於這樣的看法，實際從事「舊瓶裝新酒」創作的老舍，卻有完全不同的體會。

老舍認為「舊瓶裝新酒」的寫作方式，根本是一個極為痛苦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他在 1941 年初正式宣布放棄「舊瓶裝新酒」創作路線時，曾語重心長地表示：「新的是新的，舊的是舊的，妥協就是投降！」老舍承認一開始從事舊形式創作的時候，以為那就像「描紅模子」般地簡單，但實際嘗試之後才知道非常不容易。因為這些舊劇、鼓詞看來陳舊，但都還活生生地在民間傳唱，所以寫作之前必須先學會許多套子，再斟酌舊的情形，加入新的成分，並設法使新舊協調；而且為了抗戰，不得不有「教訓」，為了文藝，又得使之「美好」。老舍認為這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地方在於必須「用別人定好的形式和語言去教訓，去設法使之美好」，而那些別人規定好的形式和語言，看來如此的「精巧生動」，可是換成了自己用同樣的形式和語言寫作時，「就感覺到喘不出氣來」。這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說到底，就是欠缺生命力的問題，知識分子無法體會老百姓真實的生活、情感，就難以寫出可以感動自己、感動別人的作品。所以老舍也承認自己的舊劇、鼓詞是在都市裡學來的，「離真正的民間文藝還

<sup>177</sup> 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重慶），「戰線」，1940年3月24日，第3版。

<sup>178</sup> 向林冰，〈封建社會的規律性與民間文藝的再認識——再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一〉，《新蜀報》（重慶），「蜀道」，期101，1940年4月21日，第4頁。

很遠很遠」。他認為如果要寫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民間文藝，非得「寫家和演員一處，隨寫隨演隨改才行」，否則「在都市裡閉門造車，必難合轍」。<sup>179</sup>

老舍對於形式和內容之間難以協調的體會，和向林冰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他對向林冰「內容決定形式」的觀點和 1939 年以來「民族形式」的討論，始終沒有正面的回應，但老舍強調：放棄舊形式的寫作，「這個否定就是我对民族形式的爭論的回答」。<sup>180</sup>事實上，老舍的創作經驗同樣是從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只是依樣畫葫蘆之後，才發現民間文藝其實是一般大眾生活經驗的積澱，老百姓的喜好與關懷，並不見得會隨著知識分子的牽引而有所變化；知識分子試圖改變民間文藝之前，如果不能先懂得老百姓，創作出的作品一定和一般大眾之間有嚴重的隔閡。老舍說：「因舊生新易，突變急轉難。一蹴而成，使大家馬上成為最摩登的國民，近乎妄想。」<sup>181</sup>或許通俗讀物編刊社「舊瓶裝新酒」的創作理念，始終在民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擺盪，從而過分簡化了形式和內容的關係，以及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的距離，期待因舊生新，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一夕成為現代化的新國民。從某個角度來看，通俗讀物編刊社在理論上否定了五四新文藝做為「民族形式」中心論的看法，等於變相消解了五四新文藝在現代文學脈絡中的位置，這樣的態度為他們招致了許多來自同儕知識階層的責難；而「舊瓶裝新酒」堅持採行的民間文藝形式，又因知識分子的本位立場，輕忽了老百姓的主觀能動性，致使他們的創作又未必能贏得一般大眾的喝采。徘徊在民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通俗讀物編刊社，看似無限抬升了一般大眾的地位，可卻又因為無法精準抓到民眾語彙的特性，進而了解民眾真實的情感和喜好，傳遞他們的觀念，導致其內在創作上的困境，恐怕也是致使其消亡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sup>179</sup> 老舍，〈我怎樣寫通俗文藝〉，原載《抗戰文藝》，卷 7 期 1（1941 年 1 月），後收入老舍，《老舍曲藝文選》，頁 33-36。

<sup>180</sup> 1940 年 11 月 23 日，文協在重慶舉行「1941 年文學趨向的展望」座談會，老舍在這次座談會上正式宣布放棄「舊瓶裝新酒」的創作路線。見老舍，〈1941 年文學趨向的展望〉，原載《抗戰文藝》，卷 7 期 1（1941 年 1 月），後收入老舍，《老舍文集》，卷 15，頁 439-441。

<sup>181</sup> 老舍，〈談通俗文藝〉，原載《自由中國》，號 2，後收入老舍，《老舍曲藝文選》，頁 5。

## 徵引書目

### 一、報刊

- 《大公報》（天津），「史地周刊」專欄，期 1-146，1934 年 9 月 21 日至 1937 年 7 月 23 日。（據美國中文資料中心編，《史地周刊》。Washington: 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4）。
- 《大眾知識》，卷 1 期 1 至卷 1 期 12，1936 年 10 月 20 日至 1937 年 5 月 20 日。
- 《民眾週報》，卷 1 期 1 至卷 1 期 12，1936 年 10 月 2 日至 1936 年 12 月 18 日；卷 2 期 1 至卷 2 期 12，1937 年 1 月 1 日至 1937 年 3 月 19 日；卷 3 期 1 至卷 3 期 6，1937 年 4 月 2 日至 1937 年 5 月 7 日。
- 《民眾週刊》，卷 1 期 1 至卷 1 期 29-30，1947 年 5 月 24 日至 1947 年 12 月 14 日。
- 《申報》（上海），「通俗講座」專欄，期 1-72，1936 年 3 月 19 日至 1937 年 8 月 5 日。
- 《求生之路》，卷 1 期 1 至卷 1 期 5，1936 年 12 月至 1937 年 5 月。

### 二、史料

- 《（唱本 190 冊）大鼓段詞——小寡婦上墳》，雙紅堂——戲曲 189。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 《（雜腔唱本）十杯茶》，民國排印本，雙紅堂——戲曲 190。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 《（雜腔唱本）王二姐思夫》，雙紅堂——戲曲 190。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 《（雜腔唱本）馬寡婦開店》，石印本，雙紅堂——戲曲 190。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 《（雜腔唱本）新出改良十杯酒》，雙紅堂——戲曲 190。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 《（雜腔唱本）新出花鼓詞》，石印本，雙紅堂——戲曲 190。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 方 白，《大戰平型關》，乙種叢書，新刊第 13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方 白，《飛將軍》，乙種叢書，新刊第 6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方 白，《槍斃韓復榘》，乙種叢書，新刊第 29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石 鳴，《陽明堡火燒飛機場》，乙種叢書，新刊第 7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石鳴九，《新馬寡婦開店》，乙種叢書，新刊第 24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江 枚，《抗敵時令歌謠》，上、下冊。漢口：生活書店，1938。
- 老 白，《大鬧王家庄》，乙種叢書（決定版），新刊第 28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佚名，《丁方上前線》，乙種叢書，新刊第 17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佚名，《民國廿六年》，乙種叢書，新刊第 14 種。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佚名，《收商都》，乙種叢書，新刊第 4 種。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佚名，《血戰蘆溝橋》，乙種叢書。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佚名，《抗日英雄苗可秀》，乙種叢書，決定版第 1 種。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佚名，《抗戰歌謠》，乙種叢書，新刊第 11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佚名，《活捉白堅武》，乙種叢書，新刊第 10 種。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佚名，《張子青誘敵》，乙種叢書，新刊第 27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佚名，《張仰賢大戰百靈廟》，乙種叢書，新刊第 22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佚名，《趙登禹南苑殉國》，乙種叢書，新刊第 4 種。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李克，《國難十二月》，乙種叢書，新刊第 14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李克，《竇爾敦破案》，乙種叢書，新刊第 21 種。武昌：通俗讀物編刊社，1938。
- 馮玉祥，《馮玉祥抗戰詩歌》，乙種叢書，新刊第 11 種。西安：通俗讀物編刊社，1937。
- 楊晉豪，《八路軍出馬打勝仗》，大眾讀物乙種之 3。漢口：通俗讀物編刊社，1939。

### 三、時人論著、日記、書信

- 向林冰，〈封建社會的規律性與民間文藝的再認識——再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一〉，《新蜀報》（重慶），「蜀道」，期 101，1940 年 4 月 21 日，頁 4。
- 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報》（重慶），「戰線」，1940 年 3 月 24 日，第 3 版。
- 老舍，《三四一》。重慶：獨立出版社，1938。
- 老舍，《老舍文集》，卷 1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老舍，《老舍曲藝文選》。北京：中國曲藝出版社，1982。
-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冊 6。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 宋陽（瞿秋白），〈大眾文藝的問題〉，《文學月報》創刊號，1932 年 6 月 10 日，頁 1-7。
-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卷 1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新蜀報》（重慶），「蜀道」，期 29，1940 年 4 月 10 日。
- 雷文景輯，〈顧頡剛致鄭德坤信函輯錄〉，《檔案與史學》，2002 年第 4 期，頁 3-12。
- 魯迅，《且介亭雜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顧頡剛，〈我們怎樣寫作通俗讀物〉，《抗戰文藝》，卷 2 期 8，1938 年 10 月 29 日。
- 顧頡剛，《上游集》。上海：合眾圖書館，1949。
-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甘青聞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 顧頡剛，《通俗讀物論文集》。漢口：生活書店，1938。
-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卷 3 (1933-1937)、卷 4 (1938-1942)。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 四、專書

- 尹達、張政烺等編，《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下冊。成都：巴蜀書社，1990。
- 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
- 甘海嵐編撰，《老舍年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唐弢、嚴家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冊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冊1。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3。
- 劉起鈞，《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顧潮主編，《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 Hung, Chang-tai.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 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Schneider, Laurence A.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五、論文

- 小倉芳彥，〈通俗讀物編刊社の出版物——1930年代の抗日ペンフレット11種〉，《調查研究報告》（學習院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期17，1983年3月，頁61-112。
- 王愛松，〈「大眾化」與「化大眾」——三十年代一個文學話語的反思〉，《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頁24-32。
- 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33，2000年6月，頁81-158。
- 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1，2006年3月，頁131-186。
- 劉忠，〈中國現代文學話語形式的三次論爭〉，《社會科學研究》，2004年6月，頁137-143。

## The Popular Reading Publishing Company and Wartime Historical Writings, 1933-1940

Liu Long-hsin\*

### Abstract

The Popular Reading Publishing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July 1934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as an anti-Japanese academic society. Its predecessor was the Association of Anti-Japanese Chinese faculty of Yenching University. The original goal of the publishing company was to promote anti-Japanese sentiment with popular publications such as transcripts of folksongs, operas, and drum singing. The Popular Reading Publishing Company even established its own distributor, the Three Clans Bookstore. The publishing company later disassociated from Yenching University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Japanese and Nationalist Chinese governments, due to its anti-Japanese nature. The company then developed its own appreciation of how to market for the popular audience and a strategy for its publications, namely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The company published many periodicals, book series, pictorials, and readers for citizens during the war. With its extensive publications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e Popular Reading Publishing Company distinguished itself as an important association popularizing reading materials during the 1930s.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Popular Reading Publishing Company mostly focused on its famous director, Gu Jiegang, or approached it from a cultural histor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on the other hand,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by examining the recently published *Diary of Gu Jiegang*, memoirs of its other members, and less examined popular publications put out by the company itself. The article

---

\*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then discusses how its revamped style of history writing shaped modern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and national modernity. It also addresses the frustrations the company faced in this effort.

**Keywords: secularization, popularization,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Gu Jiegang, popular reading, historical writing**